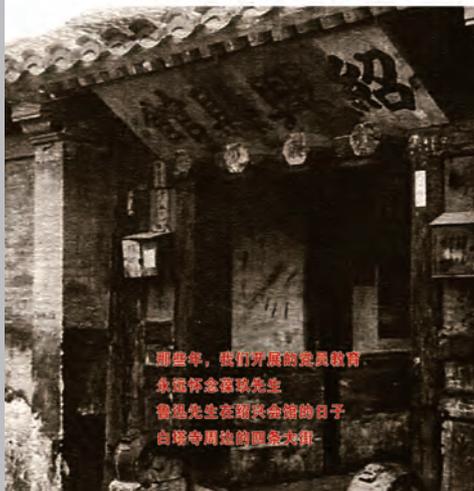


西
LOOKING BACK
TO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城 追 忆

2
2016
总第60期

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那些年，我们开展的党员教育
永远怀念邵琰先生
魏强先生在绍兴会馆的日子
白塔寺周边的四条大街

总第60期 2016年06月出版

准印证号

京内资准字2006-L0013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主办单位：北京市西城区档案局（馆）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68号

邮政编码：100054

联系电话：（010）83976501

（010）83976494

E-mail: Xczy8806@126.com

编委会

主 编： 李茂福

副主编： 金 梅 杨 真 许雪鹰

编 辑： 张小丽 符 欣 江 成

庞 晨

摄 影： 陈淑运

题 字： 爱新觉罗·溥任

封 面： 绍兴会馆

封 底： 宣阳桥

目录 Contents

兰台动态

01 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付华参加西城区档案馆日活动

02 “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揭幕仪式致词

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马素萍带队来西城区档案局(馆)调研

西城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宁听取《西城区“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汇报

档案记忆西城

03 那些年，我们开展的党员教育

——八位离退休老干部的真实经历和感悟

□ 庞 晨

西城旧景

10 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寻访记

□ 伦志清

13 探寻松坡图书馆旧址

□ 张建安

19 60年前过儿童节

□ 于永昌

西城文萃

20 北京老报刊多集西城

□ 高文瑞

23 崇圣寺历史文化浅探

□ 史可非

西城追忆

爱新觉罗溥任



往事追踪

- 28 永远怀念葆玖先生 刘嵩崑
- 31 鲁迅先生在绍兴会馆的日子 陈光中
- 40 李广桥前说故人 孙玉民
- 44 西单剧场与北京曲剧 李明德

西城随笔

- 46 白塔寺周边的四条大街 周 园
- 49 天桥走出的评剧明星 周系皋
- 51 梨园怪杰金少山 马铁汉

档案信息

- 55 资讯

中央档案馆副馆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 付华参加西城区“档案馆日”活动



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付华【右三】、北京市档案局党组成员曲安【右二】、北京市档案局区县处副处长刘立【右一】、西城区区长助理王东妮【左三】、舒了【右四】、西城区档案局（馆）长李茂福【左四】、副局（馆）长杨真【左二】、展陈科科长周海南【左一】

6月13日，西城区档案馆举行了“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西城外事礼品陈列展”开展揭幕暨档案捐赠仪式。“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是根据征集到的舒了先生近30年来走胡同、画胡同、写胡同的丰硕成果而举办的专题展览。西城区档案馆向捐赠人85岁的舒了先生颁发了荣誉证书。“西城外事礼品陈列展”展出了西城区近年来在外交交往中收到的30余件形式风格不同的各国礼品。西城区“档案馆日”活动内容还有在牛街街道菜园北里社区开展档案法制、家庭建档宣传咨询活动、举办了主题为“北京的胡同文化”的公益讲座、开放馆藏档案13430件、举行了查档体验活动和展出了“北京市旧城中心区历史照片展览”，发放各类宣传材料14种4500余份。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付华出席了西城区“档案馆日”活动，付华在讲话中指出，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也是北京市的档案馆日。近年来，西城区档案局馆按照国家档案局的要求和北京市档案局的部署，组织开展了大量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档案宣传活动，使档案工作得到了西城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舒了先生把他多年形成的档案捐赠给了西城区档案馆。希望西城区档案工作者能够履行好自身的职责，承担起维护人类记忆的历史使命，加强档案资源建设，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老北京记忆；也希望西城区档案工作者进一步创新档案宣传的内容和方式，加强档案资源的管理与开发，服务西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建设的繁荣，希望西城区档案事业不断发展，同时祝愿全国档案人健康平安快乐。北京市档案局党组成员曲安、西城区区长助理王东妮出席了活动。

在国际档案日“舒了先生 ‘胡同档案’陈列展”揭幕仪式上的致词

西城区档案局（馆）长 李茂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

大家上午好！值此“国际档案日”暨“北京市第八届档案馆日”到来之际，大家期盼已久的《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闪亮揭幕了。致此，我代表西城区档案局（馆）对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舒了先生是北京民俗文化的“大家”，他潜心研究北京民俗文化数十载，足迹踏遍北京城内每一条街巷胡同，亲手绘制出了精准的“北京胡同全图”，标注清了每一条胡同里大量详实的人文地理信息，为我们留存了弥足珍贵的城市记忆，是我们研究北京城市肌理、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依据，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北京文化研究的空白。

“留存北京城市记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西城区档案馆责无旁待的天职。近年来，我们通过拍照、征集、录音录像等方式，抢救性留存了大量城市记忆，为传承北京历史文化根脉不懈努力着。此次我们将舒了先生多年积累的个人胡同档案资料征集接收进馆，列为名人档案专卷永久保存，也是我们档案征集工作的大胆尝试。

北京文化博大精深，传承文明义不容辞。我们档案工作者将竭尽全力，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担当起那份“存史资政育人”的神圣责任，为推动西城区档案事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大家！

北京市档案局副局长马素萍带队来西城区 档案局（馆）调研

5月31日，北京市档案局（馆）副局长马素萍带队，文献处、史料处一行8人到西城区档案局调研档案编研工作，会上，西城区档案局（馆）长李茂福从突出政治主题、服务中心大局、依据档案史料、借助社会力量资源、向社会推送文化精品五方面介绍了本局馆档案编研工作开展的情况，并重点总结了“十二五”期间西城区档案局的编研成果，介绍了编研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及特色。马局长对西城区编研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鼓励，提出要以编研为龙头，倒推各项工作的开展，认为西城区的编研工作有好的传统，有自己的特色，编研角度好、选题佳，同时注重项目系列成果的开发。会上双方还就市馆与各区县档案馆档案资源共享、合作编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西城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宁听取《西城区 “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编制 工作的汇报

5月5日，西城区委常委、副区长陈宁代表区政府，专题听取了西城区档案局（馆）长李茂福作的西城区“十三五”时期专项发展规划之一的《西城区“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汇报。陈宁同志对《西城区“十三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规划》（送审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思路清晰、抓重点较准，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她强调，下一步工作要与区“十三五”规划办公室做好对接，加强联系沟通，做好规划报备、发布工作；还要加强宣传，扩大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影响力和知晓度。

那些年，我们开展的党员教育 ——八位离退休老干部的真实经历和感悟

□ 庞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中央决定，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以下简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值此背景之下，西城区档案局（馆）深入挖掘馆藏档案资料，查阅了在上世纪60-90年代期间，均有原西城区、宣武区开展全体党员教育，学习党章活动的档案记载。并以此为契机，在6月2日与区老干部局共同召开专题座谈会，邀请原西城区、宣武区曾长期从事过党的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原西城区委书记刘贵岭、原西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齐家惠、原西城区政协主席张世俊、原宣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进兴、原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解建军、原宣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栗琦、原宣武区常务副区长蒋德忠、原西城区党建研究会副会长苟忠君共8位老领导，采取口述的形式记录下他们在过去的工作中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情况，为今后我区的党建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刘贵岭：“在党爱党，在党为党，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一时间“淡化党的领导”“取消党委制改为行政首长负责制”以及取缔“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等谬论甚嚣尘上，北京市曾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政治风波”。在这一时期担任西城区委书记的刘贵岭同志对当时的现象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在基层党建上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思想建设迷茫、组织建设涣散，缺乏坚强的政治核心等等。为此，当时区委常委按照市委的要求，结合西城区的实际，在整顿基层党支部、党员重新登记等活动中着重抓了这样几个方面。

他说：“第一是严格党员标准，纯洁党员队伍，加强党员教育管理，提高党员素质。结合‘清理、清查’在党内开展了思想整顿，以学习邓小平重要讲话和江泽民国庆40周年讲话为重点，抓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为主，进一步统一对这场政治风波的性质、起因、危害以及平息这场风波意义的认识。通过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的“三基”教育，总结经验教训，清理错误思想，增强党性观念，民主评议党员，清退不合格党员、对新党员进行轮训等活动，澄清了一些错误观点和由此造成的思想混

乱。”

“第二是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实现坚持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一个时期里，在西城区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中形成了选拔、任免、奖惩干部不经党委讨论审批，而由行政领导人直接任免和奖惩。针对存在问题，区委在1989年下半年研究规定，必须恪守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党管干部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组织保证；重新明确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的生产经营开展工作；重新明确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企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对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支持和保证行政领导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重新明确各级党委必须按照党管干部的范围权限，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方针政策，做好选拔、任免和管理工作。结合清理、清查工作对全区处、科级干部进行了考察考核，调整了一批干部，选拔了一批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廉洁奉公、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干部。”

“第三是开展抓基层、打基础的活动，下大力抓好基层党支部建设。区委当时明确提出两条：一是目标，明确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必须把党的基层支部努力建设成为保证完成党的各项任务的坚强政治组织；二是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企事业单位要重新修订和细化两个“条例”（即《党的基层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教育、卫生系统和企业、事业单位无论实行何种领导体制，党委都应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全面行使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管理干部，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落实；所有区委常委均应直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加强工作指导。

按照市委要求，街道党委均改为区委的工委，作为区委的派出机构，对辖区的政治、经济、行政和社会文化等实行政治领导。

对所有基层支部书记进行了分期分批的轮训。

结合建党70周年在党员中开展了‘共议党史、继往开来’的系列教育活动，大家把学习与回忆结合起来，畅叙党的光荣史、奋斗史、传统史、成就史，以史明鉴，进一步坚定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

“第四是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专门研讨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推动各项工作。1991年我区专门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认清形势，把握导向，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努力把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等问题。我结合我自己多年的实践，亲自动手写出了报告。分别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及其应发挥的导向作用、激励作用、保证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有计划的系统的正面教育与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关系，发挥整体效能；思想政治工作的虚功实做，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的结合；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要‘情’‘理’‘术’并重（即坚持原则讲道理，关心群众讲感情，因人施教讲方法）；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教育别人与提高自己、身教重于言教；以及对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建设等问题作了阐述，受到了与会同志的好评。”

虽已退休多年，但刘贵岭同志在学习上一直紧跟党的步伐，他说：“我觉得我们退下来的老同志要发挥政治优势和经验优势，积极地为党和人民增添正能量，要自觉投入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之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做一个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老同志更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在新的形势下尽己所能为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贡献力量！”

结合当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刘贵岭同志用自身的感悟为我们阐述了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

他说：“一是必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活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坚定信仰，保持政治定力；二是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坚强党性；三是必须具有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操，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人民的人。”

齐家惠：“过好党的组织生活，‘三会一课’很重要”



齐家惠同志有着多年从事组织工作的丰富经验，她认为在抓党员队伍建设、开展党员教育上，“三会一课”很重要，其中过好民主生活、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关键。围绕着做好“三会一课”，前期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她说：“就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说，党员就得多深入到群众当中，不能脱离群众，要多听取群众的意见。另外跟个别党员谈心、交流，这也是会前十分繁重的任务。有的不只一次的谈心、交换意见，为了开好这个会，首先就得做好调查研究，做到有理有据，又得跟同志交心，会上还得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先检查自己，这样才能使会开好。”

齐家惠同志强调过好组织生活会要讲究公心原则，她说：“你得一心为公来做这个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工作，是为了爱

护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缺点说出来，咱们共同帮助你去改正。改正的目的是为了工作好，所以你出于公心，不要有私人的想法，这样才能够敞开思想。作为领导更要敞开，你得给党员群众做榜样，更得严格，更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能够肯于自己亮包袱、亮底，让大家都给你提意见，你不能计较每一件小事都提得十分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同志们肯于给你提就算爱护你。”

齐家惠同志用质朴的语言奉劝当下的年轻党员干部：“一定要学，学是精神食粮，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才能使党的工作不断提高，党员个人不断地成长。”

张世俊：“抓党建，必须占领意识形态领地”



曾担任过原西城区委宣传部长的张世俊同志在谈到开展党员教育活动时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他为我们回顾了原西城区在宣传工作上从力量薄弱到壮大、宣传手段从单一到多样的过程。他说：“过去宣传部只有15个人，但尽管人少我们却专设有一个党员教育组，对党员教育这一块没有丢，区委一直特别重视党员教育工作。在宣传媒体上，由于

区委书记的大力支持，拿到了新闻出版局批准的刊号，由此创办了北京西城报，在全市宣传工作中也起到了带头作用。紧接着又成立了新闻中心，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新闻平台作为宣传阵地，就可以把全区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事迹，通过我们的媒体宣传报道出去。”

在谈到抓好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上，张世俊同志有着他的点睛之处。他说：“我们当时在全区共设有80个思想动态联系点，包括党员的思想情况、思想动态，都能及时地搜集上来，然后反映给区委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另一方面，我们宣传部常抓党员的经常性教育，由宣传部党员教育组及时搜集在基层党员教育中取得的经验，以一大批党员教育先进典型、先进人物为代表在全区进行宣传和推广。”

张世俊同志又为我们提供了几条党员教育的宝贵经验，他说：“第一就是必须要抓住党员的理想教育，如果党员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没有追求、没有目标，你还是党员吗？无数革命先烈之所以视死如归就因为他们有崇高理想支撑，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古语云：‘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欲灭其史先灭其文，欲灭其文先乱其观’，把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整个都打乱了，没有信仰没有追求，你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国家还能存在？那更不用说什么党了，所以我觉得党员的理想教育，就是我们党课教育的重中之重，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第二就是必须坚持一把手讲党课。一把手讲党课最大的好处就是，他能够结合全局整体情况，结合全区的廉政教育开展情况以及他自己对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用自身的经历生动形象地对每个党员进行教育。一把手讲党课既是教育党员也

是自我教育，打铁首先要自身硬，要敢于‘向我看齐’！第三就是在党员教育中注重党章的学习。为什么把党章作为一学，因为没有党章就没有规矩，没有规矩则不成方圆。党章的作用就是告诉党员你应该怎么做，应该做什么，你的权力是什么、你的义务是什么，所以进行党章、党规的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严于律己的重要形式。另外在教育方式上，我觉得也应该灵活多样。要发挥全体党员，发挥各级党组织的创造性，采取形式多样的方式对党员进行教育。档案局搞的存史育人，让老同志讲一讲党员教育，我觉得就是个很好的办法，这也是党员教育一种很好的形式，也希望档案局今后创建更好更多的形式，为全区教育开辟一种新的形式。”

赵进兴：“不忘入党初心，永远对党忠诚”



原宣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进兴用他自己入党的经历为我们讲述如何做一名合格党员。他说：“1958年，我加入了共青团。后来，有个问题摆在我的面前，三面红旗刚过，怎么就到了困难时期？我想不通，就把自己的想法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就开始萌生了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经过组织的教育，我慢慢地认识到要想战胜困难必须

紧跟党，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才能够战胜困难。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后，我严格要求自己。坚持每个月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工作、生活，接受组织的审查和考验。在这段时间里，党组织对我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帮助。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我告诫自己：入党不仅是自愿，更是志愿，一定要永不后悔，永不叛党。党支部大会讨论我入党的时候，特别是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哭了，落泪了，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我已经是党的人，就要把自己交给党，不仅要组织上入党，更要思想上入党。”

“在入党后的50余年里，我对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认真真，对同志以诚相待，对困难能够担当。特别是退休后，做了十年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凭着一颗心、一片情、一生的实干，为党的事业，为党支部的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建军：“党员学习不搞特殊化”



原西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解建军谈到自己经历过的党员学习时说：“我过去去过组织生活，大概是在每周二下午组织正式学习。当时我妈说，你们还有半天呢，我们那会儿都是要下班以后、要不上班以前党员在一块儿学，就没有说利用工作时间

去学习的。我想这个确实也对，为什么呢？你党员凭什么搞特殊不上班去学习呢？对吧，所以我就想党员在一个单位里边，他既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又有一个普通的身份，普通的身份是这个单位的一个工作人员，特殊的身份就是你是一名共产党员。那么这两种身份结合在一起，决定了你在工作岗位要有党员的意识，发挥党员的作用，引导身边的工作人员去实现党的目标。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党抓党员队伍的教育，打造一支政治坚定、组织坚强的队伍是头等大事。党章总则中明确写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咱们已经八千万党员了，就算我国16亿人口，一名党员可能要影响20个人，何况咱们还没有16亿人口，一名党员要影响十来个人，再加上我们还有一些外围组织呢，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等，我觉得八千万党员这在世界上也是基本没有的，就中国独一份，应当发挥好每个党员的引领作用。”

栗琦：“党员教育，关键得抓基层”



原宣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栗琦谈了她的体会，她说：“党员教育，关键得抓基层，因为咱们基层党员占的比例比较大，基层这块石头稳了，整体才能稳，党中央的这些方针政令才能一通到底，

才能执行起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抓基层党支部、抓党员教育非常正确，今后也应该在这上面下大力量继续抓。”

蒋德忠：“学到心里，做到实处”



原宣武区常务副区长蒋德忠同志对于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怎样去学，他谈了自己的几点体会。他说：“我觉得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因此首先要系统地、全面地学习有关规章制度，学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党对学习教育历来都很重视，如果说得远一点有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解放后有许多学习教育活动。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有一系列学习教育。80年代中期有一个整党的学习，1989年政治风波后有党员重新登记的学习教育。近几年学习教育就更多了，1999年的‘三讲’，后来有‘三个代表’‘先进性教育’‘群众路线教育’以及去年的‘三严三实’和今年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我觉得我们党是一个特别重视学习教育的党。”

“学习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要解决思想问题、立场问题、方法问题，当然也要学好各项规章制度。现在出了好多腐败问题，我觉得这与没有学好有很大关系。学习不光是背诵条文，你要学到脑子里去，学到心里去，要理解精神实质，更要把它作为行动指南。我为什么这么讲？我翻了一下去年

公布的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光分则就有六章85条，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共6个方面中央都做了明确具体规定，党员违反这些规定必须要受到处分。但是你看到中纪委公布的违纪行为还大有人在，不少人还在顶风作案。这说明这些人还是没有学好，没有学到心里去，没有真心领会精神实质，虽然学了，但没有照着做，是两张皮。”

他说：“还有一个就是，党的理论也是与时俱进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现在学习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我觉得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发展的，也是一脉相承，互相联系的。我认为学习确实是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必须要把学习教育抓紧抓好，抓细抓实。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在做，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学得再多再好，如果没有在行动中体现出来，说明还是没有真正学到心里。老百姓不光是看你怎么说，关键是要看你怎么做。说一套做一套不行，时间长了就没有人听你了。因此，关键在做，要用实践来检验，要在行动中来体现。”

苟忠君：“坚信党是追梦的旗帜，忠于党是合格的灵魂”



原西城区党建研究会副会长苟忠君曾是一名守卫在天安门、宣誓在国旗下警卫战士党员。对于做合格党员，他提出了两点：“第一是要坚信我们的党。要自觉做到任何时候都不疑惑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始终保持高度一致。任何时候都不动摇跟党走坚定信念，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开拓创新，继续前进，自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把为党的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任何时候都不违背党的宗旨、党的纪律、党的规矩，明德至翠，笃行于微，言行一致，守纪如铁，自觉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赶考路上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卷。第二是要忠于我们的党。就是要忠于党的纲领，忠于党的领导，忠于党的伟大事业，忠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要在党爱党，在党护党，在党为党，在党建党，保持党兴我荣、党风我正的浩然正气。就是要牢记‘两个务必’，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牢固树立红墙意识，大力弘扬西城精神，发挥正能量，当好先锋队，筑梦路上永远跟党走！”

北京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寻访记

□ 伦志清



珠朝街胡同牌

我出于对北京会馆文化的青睐，多年来倾心关注历史上曾在北京宣南的三个独立的东莞会馆，又由于我的祖父、父亲和我三代曾居住烂缦胡同127号东莞会馆和上斜街56号东莞新馆，我知之较清楚，因而寻找珠朝街老东莞会馆便成为我的心病。鉴于曾有老东莞会馆简单记载，我查询许多有关会馆历史档案资料无果，早于上述两个会馆的老东莞会馆确切位置及建筑历史如迷雾疑团。我带着疑问和好奇从2006年开始了多年的调查研究的寻访之路，直到2011年，北京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才以真实面目初露端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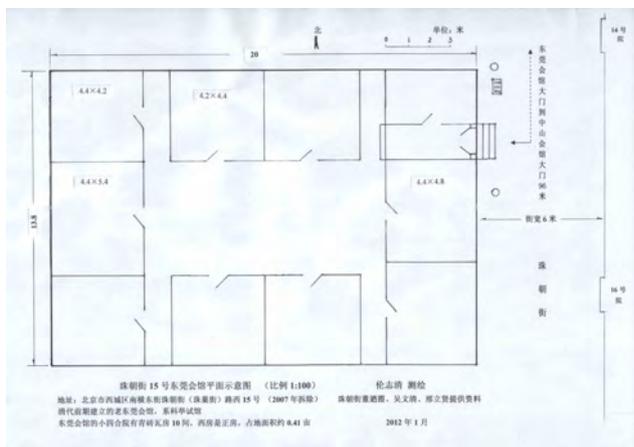
珠朝街过去叫“珠巢街”，是北京南横街一带的古老街巷之一，少年时，我和小伙伴放暑假到陶然亭游泳池，经常步行穿过菜市口丞相胡同，走珠朝街、东拐过红土店胡同；有时直行官菜园上街至南口，这里汇合珠朝街西口，南边有高台庙是西观音院，其连接东观音院有一个过街楼，我总爱逗留而好奇地抬头观望这破旧而古朴的过街楼，其北侧拱形门洞上刻有“金绳”二字，南侧刻有“觉岸”石碑，至今仍记得落款年代是清道光年。后来我骑车上班或路过也是惜古怀旧地驻足端详这个北京难得一见的过街楼，后因开通菜市口南大街及扩建健

宫医院而拆掉过街楼。没想到我几十年后和珠朝街结下不解之缘，因为我近几年去珠朝街调查寻找老东莞会馆不下几十次。

清代同治年，住珠巢街东莞会馆的几名东莞县老乡，在书残页上看到东莞先烈张家玉在烂缦胡同（过去称：烂面胡同）家中写的诗句，袁崇焕和张家玉素有东莞二烈之称，寻到明代张家玉原在京师的烂缦胡同故居，东莞县出资银两购买了烂缦胡同129号（旧时49号）的40间房的院落，于清光绪元年改建为东莞会馆。而珠巢街老东莞会馆逐渐弃用，淡出人们的视线及记忆。珠巢街东莞会馆到底位置几号院？什么建筑格局？为什么弃用？……未见历史记载，成为“迷”？

2005年我退休后，立即到南横街南侧的珠朝街寻找老东莞会馆，进胡同西侧5号院是知名的中山会馆（过去称：香山会馆），因居住过孙中山先生而闻名遐迩。在胡同口当我询问到第三个人时初见晓，我看到珠朝街3号院门口有一位70多岁老者，忙上前请教：“您听说过老东莞会馆吗？”他泛指南边并说：就在路西的不远。我喜出望外疾步寻找，可是问了许多院落和人员，都不知道老东莞会馆遗址，再回来找知情的老者已不见身影，我怏怏而返。

2006年以后，我经常到宣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和宣武区档案馆、北京档案馆等有关部门查询，查阅大量有关北京的会馆资料，均不见对珠朝街东莞会馆的详细记载，如2007年4月出版的《北京会馆资料集成》上册附：“以下会馆（东莞会馆宣武区珠巢街）因仅见于学术专著，未见史料佐证，或未经实地考察，故仅列于此，供读者参考。”我也查看过根据历史《宣南鸿雪图志》编制的《北京会馆图》的部分，仔细看了中国地理历史专家及地图测绘专家绘制的珠巢街胡同区域的会馆地图，其绘制、标志、分类很好，遗憾也没有



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平面图

标示珠朝街东莞会馆的门牌号等详情。

2008年7月，我抽时间又去寻找珠朝街东莞会馆，展现在面前的景象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只见珠朝街的西侧已成一片瓦砾，留下几棵孤零零的树晒得叶子发蔫。路东侧的房屋院落没有拆迁，唯一留下珠朝街路西侧是南口正在修缮的中山会馆。一打听，居民说珠朝街的西侧早于2007年拆平了，包括老东莞会馆的房子。我坐在路边心里直报怨不早点来或者晚点拆，会馆没了！当我往回走到中山会馆东门时，看到有几个人在拍摄大门外景，一问得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在拍摄《会馆》专题片，我觉得有缘且眼前一亮，忙问：“你们知道这珠朝街曾有东莞会馆吗？”回答是否定的，有一个编辑说：“我们知道上斜街有一个东莞会馆，要去摄像。”我笑着说：“这个，我比你们熟悉，我家三代曾住上斜街东莞会馆。”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对我说：“真的？我们正要找熟悉上斜街东莞会馆的人。”我接受了该摄制组女主编刘主任邀请，两天后我参与了在上斜街东莞会馆的现场采访，并于2008年8月1日中央电视台国际4频道播放了“走遍中国”专题片的《会馆旧事》视频。

2010年8月，我和北京东莞建设研究会副会长张世光，陪同东莞市人民政府驻京联络处刘学聪主任和东营有限责任公司蓝松青经理等人去三个东莞会馆遗址实地调查。我们站在珠朝街中山会馆未建的南部围墙边，望着曾包括东莞会馆遗址的残砖碎瓦，一脸茫然。我试着走到南边不远树下乘凉的

人，打听到赤膀壮汉叫刘福利知道东莞会馆的位置，他把我们带到离中山会馆南围墙数十米的地方，指着地面说：会馆是不大的砖瓦房的院子，小的时候常到这里玩耍。我和张世光还与刘福利在此照了合影。我认为，历史遗迹重在考证建筑遗迹，遗迹灭失重在人证及知情叙述，我重点采取寻找熟悉珠朝街东莞会馆的人证入手。

2011年5月10日，我拿着与刘福利合影的照片，又到珠朝街居民中打听并找到其本人，刘福利对东莞会馆知情有限，又推荐找知情人珠朝街12号老住户邢立贤先生，我见到的邢先生当年72岁，中等身材，熟悉会馆且健谈，他说：“原珠朝街15号院在路西（已拆），是历史上的东莞会馆，即现在的珠朝街14号和16号之间（路东）的房山墙对过是珠朝街15号大门，此门在两棵大树之间，会馆院地势较高，从大街要上三级台阶，稍靠北侧路边有一个流雨水的铁算子，这片房子是2007年拆的。1956年他少年时住到了珠朝街，经常到门牌15号这个东莞会馆院里玩儿，街坊口碑流传也如此。”

历史遗迹的证实必须真实可靠，为此，我又多次走访珠朝街老住户，来验证邢立贤先生的叙述。2011年9月，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寻访到另一位知情者是中年女士董迺霞，住珠朝街东侧16号院，她小时候及成年后常到东莞会馆及周边院里玩儿或者办事，因此知道东莞会馆的建筑格局和一些事。她主动带我来到老东莞会馆遗址，用手指着两棵树之间有部分残存的青石台阶说：这就是会馆的大门位置，靠北确实有一个下水道铁算子，和邢立贤的说法基本吻合，她还指点我当场用纸草绘该会馆的数间房建筑格局。说起来还有巧合，当我带着问题及核实情况第三次找到董迺霞时，才得知她与丈夫吴文清是发小，后来结婚，吴先生的父亲和他都是从小在珠朝街长大，对东莞会馆熟悉不在话下，我喜出望外地又和他聊了会馆简况及老北京风俗。

综合知情人董迺霞、吴文清和邢立贤等人对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的描述，共同点还有：东莞会馆是典型的老北京古建小四合院民居形式，大门坐西朝东，门两侧一对方形石门墩，两人并行能进院，



中山会馆大门

门道右侧有一间小屋，过道顶头是北房的山墙，下一个台阶左转看到里面是呈长方形小院，东西方向长，南北宽约3米，没有树，对面西房3间略高大是正房，另有东房3间、南房2间和北房2间，是共有10间青砖瓦房的四合院。此东莞会馆的房屋建筑比周边类似院落规整且质量好，此院的房背后是官菜园上街开门户的另院。

在历史上，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弃用后，几经易主，有证据的，是知情人吴文清对我说：此会馆院原住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患神经病的儿子居住，生活窘迫，在上世纪80年代老太太将私有房产转卖给在西客站开饭馆的林先生。后来林先生对会馆房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建筑格局没有改动，大门涂成了红色。在2006年至2007年此地办理拆迁，林先生拿拆迁房款30多万元搬走没了音讯。有的人说：那个买会馆房开饭馆人叫林峰。对此，董迺霞和邢立贤等人与吴文清说法一致。

历史上南横街和珠朝街一带会馆众多，不长的珠朝街就曾有中山会馆、成都会馆、云南会馆、川东会馆、东莞会馆、扬州会馆、泸州会馆和太仓会

馆。据邢立贤先生听胡同老人沿传，逢举子到京城考试的年月，在珠巢街和南横街一带，夕阳晚霞映照，举子们复考完或晚饭后，仨一群、俩一伙儿在街上遛弯儿，从后面看一水儿的大辫子（清朝男人蓄发一条辫子），成为街头一景儿。

2012年我再到珠朝街，标示15号院东莞会馆位置的两棵树已经移走。如何保留历史及记载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历史地理位置？我采取了测量坐标和绘制此会馆平面示意图方法，到实地用卷尺测量胡同南北方向，从珠朝街5号中山会馆的东门（正门、相对永久保留物）台阶到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残留台阶，直线距离是96米，也就是说，中山会馆5号院跨过7、9、11、13号4个院落就是15号老东莞会馆；从东莞会馆残留台阶到对过珠朝街14号和16号之间（路东）的房山墙直线距离6米（东西街宽），由此标注出了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的确切位置及建筑格局（见附示意图）。

我查阅了大量的北京会馆资料及实地考察，推测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的建立时间应该是在清代乾隆年后期。明代至清代，广州府在京城建有几个知名的会馆，比较后建的有位于原宣武区前孙公园胡同路北25号广州七邑会馆，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建立，我曾走访此会馆，共有房屋46间，“广州七邑”指清中前期广州府下辖的东莞、清远、龙门、增城、新安、新宁和新会县；该馆由七邑旅京人士集资建筑，以便七邑人士来京应考居住，每县平均占有6间房，盛世举子们居住更显紧张，东莞县隶属广州府，地处珠江三角洲而富庶，靠广州近，开放早，人才多，举子增加不够居住，会馆就得增建。东莞县第一个独立的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应该是在广州七邑会馆建立之后应运而建的。

2014年5月，我到珠朝街故地重游，看见西侧东莞会馆遗址周边平地上盖起了“国家电力网科技博物馆”，会馆遗址的东侧又拆除了一片平房，正在开阔地建街头花园；再浏览紧邻的中山会馆已修复一新，不由得想起，我寻访到的珠朝街15号东莞会馆只是历史记忆的一个“点儿”。

探寻松坡图书馆旧址

□ 张建安



快雪堂大门外的石碑

人的一生中，可能有不少念头，虽然并不重要，可有可无，但常会因为一些机缘被重新勾起，引发探寻的趣味。就像我想要探寻松坡图书馆旧址的兴趣，便经历了数年的时光。

松坡图书馆是以蔡锷（字松坡）的字命名的。1915年，蔡锷发起护国军讨伐已经称帝的袁世凯，以百病之身，奋勇向前，为中国人争人格，推动了中国的进步。然而，次年的11月8日，蔡锷便因病去世，引发世人不尽的哀悼。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十分悲痛，写《挽松坡联》哀悼：“知所恶有甚于死者，非夫人之恸而谁为。”除参加公祭外，梁启超还率仲弟仲策等私祭之，祭文中无限伤感：“血随泪尽，魂共岁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何忍自洁而不我俱。”为了让世人永远记住蔡锷，梁启超特地发起倡办松坡图书馆，并使其成为民国一段时期的文化重镇，留下了很多文人学者的足迹。



快雪堂牌匾

第一次知道松坡图书馆，是多年前读金克木先生的文章。金克木18岁时来到北京，本来怀揣着上大学的梦想，但事不如意，只好到处寻找图书馆，到这些免费的“自费大学”中自己读书。有一次，他便来到了松坡图书馆，有了这样的经历：“一处是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是纪念蔡松坡（锷）的。他（指金克木本人）为此游了一次北海公园。这个图书馆设在僻静的小山中间，门口有个不大的匾。全是西文书，摆在那里任人取阅。陈设很精致。有一张蔡松坡的放大像。看不到有管理人员，无人把门。看书的人没有几个，都是中年或老年；从服装上看，全是上流人士。穿蓝布长衫的学生装束的只他一人，却并没有人对他注意，更没有人来监视他或竟赶他出去。因此他觉得自己更应该有读书人的风度和气概，不能被人瞧不起。这里根本不要入门证。门是敞开着的。书又许多大部头的，新旧全有。除陈设的以外，大概还有书库，那就要找管理的人借阅，要办手续了。”（金克木：《游学生涯》）

金克木这些文字勾起了我的一些记忆。我是1995年到北京当北漂的，也是很想去图书馆读



穿过大门看到激观堂牌匾

书，但当时办理北京图书馆借阅证似乎还需要类似中级职称等证件，我因此被挡在了门外，只能到小一点的海淀图书馆借书看。即便如此，当我在小小的阅览室坐下来读书时，心里已是非常满足。当时对图书馆的那种虔诚真是无法形容。所以当我了解到金克木能到那样好的松坡图书馆读书，而且图书馆就在风景如画的北海公园，羡慕之情油然而生。松坡图书馆由此也映入我的脑海。有一次游览北海公园时，便想试着寻找松坡图书馆的旧址。记得当时有这个念头时，我正在北海南岸的琼岛景区。因为脑海中只有松坡图书馆这几个字，其它任何线索都没有了。如此随意，自然没有任何收获。问工作人员，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都知道这儿以前是皇家园林，哪还知道有什么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呢？！

此后，松坡图书馆几个字总是淡淡地留在了我的脑海，而且隔几年还会重温几次。在我撰写《低学历的五大师》中的金克木时，松坡图书馆自然是要被提到的。当我撰写《为了美好的中国》中的蔡锷事迹时，松坡图书馆又一次被提到。当我2011年编辑关永礼先生的《京城文脉》时，其中的一篇文章《国家图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又见到了松坡图书馆五个字，并且知道：“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图书馆迎来新生。1950年3月6日更名为国立北京图书馆。1951年更名北京图书馆。为纪念讨袁护国的爱国将领蔡锷而开设的两座松坡图书馆（北海公园快雪堂第一馆、西单石



激观堂与第一进院落

虎胡同第二馆）也并入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就是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原来，松坡图书馆还有这样的贡献。一次又一次，松坡图书馆似乎在我的脑海中很清晰了，但可惜的是，我仍然不知道它究竟在北海公园的哪个具体方位。虽然偶然间也滑过再去寻找的念头，但总是很快被其他的杂事牵扯开来……

真正有了再次寻找松坡图书馆旧址的浓厚兴趣，是在2015年12月20日。当我翻阅《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时，松坡图书馆又一次映入我的眼帘。其中引用陈封雄《陈寅恪曾任蔡松坡秘书》中的这些文字：“我入中学后，有一次随寅恪叔去游北海公园，走到九龙壁附近的松坡图书馆，我问他‘松坡’是人名还是地名。他于是给我讲了蔡松坡的故事。他说蔡松坡为了逃脱袁世凯的监视，在戏院的包厢里坐了不久就留下衣帽以蒙蔽监视者，溜出戏院直奔前门火车站去了天津。过了许多年我才知道寅恪叔26岁时曾在蔡松坡手下任过几个月的秘书。”当我读到这些文字后，



快雪堂的假山

我就想着在这个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地方，曾经留下多少文化人的足迹、留下多少文化人的美好记忆，它是值得我花时间去认真探寻的。

当晚我就给关永礼先生打电话，请教关于松坡图书馆的情况。正好，他新写了一篇《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的文章，第二天他便给我发了过来。在这篇文章中，松坡图书馆的形成、变迁以及确切地址已相当清晰了：

蔡锷因护国之役名扬天下，惜其英年早逝，梁启超“谋所以永其念者，则有松坡图书馆之议”。12月6日，梁启超通电全国，称“蔡公松坡，功在社稷，民不能忘，沪上同仁，议设一纪念图书馆，即在馆中奉祠铸像，庶可以范后人而垂不朽”，倡议得到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为顺利推行，由北洋元老徐世昌出面发起，设立松坡图书馆，委托梁启超筹办，公推梁氏为筹办主任。由梁启超亲手拟定了《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以解决经费问题。此件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手稿上有涂改痕迹，墨渾犹新，弥足珍贵。此外，梁启超还在朋友中发起成立蔡公遗孤教养协会，承担起抚育蔡锷遗孤的责任。

为了尽快建成松坡图书馆，使之成为“灌输新学，嘉惠青年”的场所，梁启超连日与商学各界人士接洽，奔走操劳，在上海新闻路30号设立“松坡图书馆筹备处”。在与徐世昌的通信中，详尽商讨了建馆的筹办方针、设想及有关事宜。此信现藏天津历史博物馆，以楷书书写，信纸为

“松坡图书馆筹备处用笺”。信中，梁启超建议，建馆地址北京、上海两地皆宜，“论首善观听所系，自当在北京”，而“上海当南北主枢，交通最广，一切设备维持皆较便利”，当时北京正在扩充教育部图书馆，先在上海建馆，如集款有余，可再推及北京。

… …

1920年3月，梁启超访欧归国，带回万余册图书，又以北京旅美同学会的名义在北京西单石虎胡同宗学旧址设立了一个图书俱乐部，收集到尚志学会、亚洲学会等2000余册日文图书和其他外文图书6000余册，这些书后成为北京松坡图书馆第二分馆的主要馆藏。还得到北京政府拨赠的杨守敬部分藏书24000余册。至此，建馆条件基本成熟。由于松社同仁以北京居多，经协商，决定把松社和松坡图书馆迁至北京，并向政府申请在京馆舍用地。

… …

1922年9月，呈请得到批准，民国政府同意拨出北海公园内快雪堂和西单石虎胡同7号官房作为松坡图书馆之用。10月16日，财政部以财字第2879号函：“准设松坡图书馆，蒙大总统（黎元洪）准拨北海快雪堂一所… …所有西单牌楼石虎胡同第七号财政金融学会借用官房一所，应拨给松坡图书馆永远为业，以备收藏而资建设。”并对房屋加以修葺。

… …

1923年11月4日，历经一年余酝酿、筹备与搬迁，在北海公园快雪堂召开松坡图书馆成立大会。设快雪堂为第一馆，专贮中文图书；西单石虎胡同为第二馆，专藏外文图书。由于北海公园迟迟未批准对外开放，因此第二馆1924年6月1日先行开馆。直至1925年8月1日，北海公园正式对外开放，10月1日，第一馆开馆，正式接待读者。

第一馆快雪堂位于北海公园北岸，因乾隆帝



快雪堂长廊与书法石刻

观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得名。

在梁启超的倡导和推动下，松坡图书馆不仅成为学子们读书学习的好地方，而且也成为学术交流的重要场所。梁启超曾请各地名家前来讲学，这里因此留下了蒋百里、林宰平、梁漱溟、胡适、熊十力等学者的足迹，也留下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等人的足迹。熊十力还曾在林宰平的安排下在这里住宿读书。我似乎隔着沉默的文字，能够看到熊十力、林宰平在此热烈讨论的画面。

这时我已确定北海内的松坡图书馆旧址即为快雪堂。但快雪堂究竟在北海公园内的哪个确切位置？里面现在是什么情形？我依然并不清晰。也许我以前曾去过那儿，但没有特别留意……

事也凑巧，2015年12月22日收到朱小平先生大作《清朝被遗忘的那些事》，当天便在一咖啡馆通览全书，尤其是《右翼宗学的名人遗迹》一文引起了我的格外关注。因为右翼宗学的遗址正与松坡图书馆有关。

文中介绍：“位于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的右翼宗学遗址，不仅与曹雪芹有关，且与清代和近代名士巨子多有因缘，……著名的‘新月社’也在这所庭院宣告成立。”“蔡锷病逝之后，他的老师梁启超为纪念这位名噪中外的得意弟子，于1923年在右翼宗学遗址办松坡图书馆，他自己捐了10万册藏书。该馆还收集了大量与蔡锷有关的报章杂志、书籍等资料，当时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任该馆干事，并协助处理有关英文函

件。徐先生在此期间，还写了一首题为《石虎胡同七号》的诗，描写这所故宅的景致。”朱先生这些文字介绍的正是松坡图书馆第二馆的情况。

对于我一直想要寻找的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朱先生则如是介绍：

后来，松坡图书馆一度迁到北海公园内澋观堂里的蔡公祠。20世纪50年代后，由陈叔通先生一手经办，移交给了文化部。此后蔡公祠和松坡图书馆均被关闭，用作文化部仓库之用。20世纪70年代，某地拍摄电影《小凤仙》，摄制组曾到蔡公祠和松坡图书馆查阅资料，据说蔡将军的遗物军刀、望远镜等仍在，而且发现了大批与蔡将军有关的书报杂志，其中蔡锷的大幅原版相片，竟成了拍摄电影中蔡将军的造型依据。当时报载，还发现有梁启超在内的签名纪念册（可惜未说明其他名人的名字，可见这类文物单位保存的珍贵资料不少。曾偶见报载：北海澋观堂已由文化部交还北海公园，对外开放，但蔡公祠与松坡图书馆如何处理，却不得而知。

朱先生这些文字更加使我下决心亲自一探究竟。只是他提到的是澋观堂，而不是快雪堂。这二者究竟是何关系？在网上查也没查出个结果。只是查到快雪堂是一个三进院落，庭院深处收藏着以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为首的历代名家的书法石刻。它就在北海公园的北岸，九龙壁的附近。应该能够找到。

虽然我已在2015年12月22日定下了探寻松坡图书馆旧址的计划。但那几天的北京，雾霾重重，连日不散。12月26日中午，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些蓝天，我马上出发，由通州乘地铁赶往北海公园。没想到出了地铁站，北海公园仍笼罩在雾霾当中。我决定速战速决，只找快雪堂，其它景点一律不去。

此次目的性很强，而且在地图上了解到快雪堂的位置，所以找起来很容易。从北海公园北门进去，沿着北岸向西行进，不到十分钟，便看到



浴兰轩与第二进院落

了松柏掩映中的一块白色石碑上刻着“快雪堂”三个字。上面还刻着中英文，显示在2013年9月，快雪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

此处院落显然是在一个小山坡上建的。拾阶而上，大门外东侧立了一个“快雪堂书法博物馆参观须知”的牌子，但门上却没有“快雪堂”的牌匾，相反，穿过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一进院的正屋上挂一牌匾，上面写着“澋观堂”三个金色大字。

“难道澋观堂只是快雪堂的一部分？”我这样猜想，便想赶紧进去。不料快要进门的时候，发现里面没有一个参观的游客，只是有人在整理地面。“是不是今天不对外开放？”我有点犹豫了。因为在网上也看到快雪堂在重新整修办书法博物馆的类似消息。“可是，我今天是一定要探寻个水落石出的。不可以无功而返。”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观察里面的情况。

院内建筑前的人员，他们应该是整修公园的工人。我若进入，他们不应该阻拦。而一入大门有一个小的简易屋子，里面有一人，可能正是类似于守门的工作人员。这可能会成为我的阻碍。

“如果真是不让参观，我岂不又白来了？！”我正考虑着如果这位工作人员阻拦我，我该如何应对时，可巧，我突然发现他正在那儿眯着眼睛打盹。“真是天赐良机，看来该我进去。”于是我便尽量放轻脚步，迈入大门，然后马上向右，加快脚步往里走去。生怕受到阻拦，所以迅速从第一院落进入第二院落，然后才放心地进一步探寻。

第二院落与第一院落都非常宽阔，给人以清爽敞亮的感觉。两边有走廊，主体建筑与第一排澋观堂风格相仿，红柱金雕灰瓦，面南背北的正屋牌匾上写着“浴兰轩”三个黑色大字。这里也不是“快雪堂”，那么“快雪堂”究竟在哪里？

当我快步走入第三院落的时候，突然间就感觉“快雪堂”就在这里。这里的氛围一下子变得非常特别，与第一、二院落截然不同，说不出的沧桑幽深之感。而且最为特别的是，进来之后，首先看到到就是一个巨大的假山，这座假山似乎将整个院落全部占据了。再往前走，“快雪堂”三字赫然出现在眼前，而快雪堂的主体建筑更是与众不同，它不是那种红色的亮堂富贵的感觉，而是完全的古朴的楠木，没有任何着色，与古

树、假山一起，让人一下子静了下来，十分肃穆庄重。我马上记得以前我是来过此地的，但并不知道此地有什么渊源。这一次，当我确信此处就是松坡图书馆旧址时，如入宝地，仔细观察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并试图透过紧闭的大门的门缝，看看能否见到里面的遗物。我也流连于快雪堂两侧的书法石刻前，品味着其中的书法韵味，也想象着当年梁启超、熊十力、林宰平等人是怎样穿梭于此，怎样在此地静静地读书……

不知不觉，天色已暗，而雾霾依然，我却久久地沉浸于探寻的收获当中，忘却了雾霾与冷冻带来的不适，并乘兴写诗一首：

冬日访北海，只为快雪堂；二院入三门，苍然万古清。松坡书馆逝，前贤踏雪忙；乌鹊古树在，凛凛唤书郎。

并附记：快雪堂虽在清朝皇家园林内，然吾专程踏访，只为寻觅民国间读书人聚会一佳地——松坡图书馆是也。当年蔡锷病逝，其师梁启超特倡导，并以蔡锷字为名建此图书馆，当即开中国读书界一大风气，不仅熊十力等在此多所流连，时为北漂金克木者，更将此等地视为人间天堂——每每阅览前贤文章，总想知松坡图书馆究竟在何地。今日得偿所愿，特记之。

当我离开快雪堂往外走的时候，我又进一步游览了浴兰轩与激观堂。

这便是我探寻松坡图书馆旧址的经历。

此后，我又进一步从关永礼先生的文章中了解到：清初时期，本来只有激观堂、浴兰轩二进院落。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杨景素购得包括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在内的共81篇法帖石刻，并呈奉给乾隆皇帝。乾隆大喜，特在原激观堂、浴兰轩二进院落的基础上扩建第三院落快雪堂，以收贮法帖，将48块石刻分嵌于快雪堂东西走廊上，堪称不可多得的书法镌刻珍品。民国年间，这里被辟为松坡图书馆第一馆后，激观堂作为阅览室，内有阅览桌椅、书报架、目录柜，墙上悬

挂蔡锷将军戎装遗像和梁启超手书《松坡传略》《祭松坡文》和几幅蔡锷遗墨。浴兰轩作为藏书室。快雪堂被辟为蔡公祠，悬有梁启超题匾。正北设有蔡锷将军的神位，左右附祀在护国之役中与蔡锷共事者戴戡、吴传声等八人遗像。玻璃橱中陈列蔡锷生前的手札、勋章、军服、军刀和日常所用等遗物，以垂纪念。

原来，所谓的快雪堂为松坡图书馆一馆，这里所指的快雪堂其实也包括前面的激观堂与浴兰轩。

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我还看到1923年6月20日松坡图书馆择定馆址于北海快雪堂时，梁启超先生撰写的《松坡图书馆记》：

民国五年十一月七日蔡公薨，国人谋所以永其念者，则有松坡图书馆之议。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十二年春，所储中外书既逾十万卷，大总统黄陂黎公命拔北海快雪堂为馆址。于是以后庇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死事诸君子，扩前楹藏书，且供阅览。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梁启超记。

令人感慨的是，梁启超希望“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不仅是希望人们能记住蔡锷，更是想要以蔡锷的人格与事迹激励世人积极向上之情操，并使松坡图书馆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块圣洁之地。可现在，仅仅过去不到一百年，还有几人知道此处与蔡锷有关，更有几人能够怀想当年松坡图书馆中文化脊梁们的文化事业……

60年前过儿童节

□ 于永昌

我生于1945年。少年时居住在宣武门内头发胡同。上世纪50年代在我上小学期间，几次过“六一”儿童节的一些场景，至今难以忘怀。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一些街头巷尾，建起了很多小型儿童活动站。有一间宽敞的房间，有两个人就能办起来。在西单南侧，教育部街东口外就有一家儿童活动站，吸引了周围很多小孩子参加那里的文化活动。平时活动站准备了很多小人书，免费供孩子们翻看。笔者这一年刚上小学，住处离得不远，下午闲着就爱去活动站看小人书。进门时先发一小纸牌，到屋里桌前放下纸牌，在大桌面展示的多本小人书中选一本，找一个靠背椅坐下看，看完再到桌前选换。

这个活动站房间内放有十来张长靠背椅，每张椅子坐四五人，里面能容40来人看书。来的孩子多时，里面坐满了，晚来的孩子只能在门外等。里面出来一个孩子，再放进去一个。为了能不花钱看书，孩子们耐心地等在门外，并不着急。逢年过节，活动站还组织一些文化活动。对于安安静静看书，又守秩序的孩子，到桌前换书时，管理人员会发给他一张票，然后凭票参加一次活动。我上一年级时，过1953年“六一”儿童节，曾得到活动站发的票，在儿童节那天下午，先进屋看了组织学校学生表演的诗朗诵和小话剧，然后遮上窗子，放映幻灯片。放的有《田螺姑娘》《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就这样度过了我成为小学生后的第一个儿童节。

西单西侧旧刑部街东口路北的哈尔飞戏院，在1954年转为国营，更名为“西单剧场”，以上演京剧、评剧为主，也常放映电影。戏票、影票票价低廉。1954年“六一”儿童节这天，西单剧场各场电影儿童票每张都只卖500元钱（旧币，新币为5分钱）。笔者在节前兴冲冲买了5张票，儿童节这天从早到晚看了5场电影，都是国产和苏联影片，有《钢铁战士》《鸡毛信》《夏伯阳》《保卫察里津》《攻克柏林（上下集）》。这个儿童节看电影看得尽兴。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几年，北京在“六一”儿童节这天，拨出一部分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在车前挂有

“儿童车”的牌子，免费让少年儿童乘坐。这让平时很少外出乘车的孩子有了不花钱“过车瘾”的机会。1955年笔者上三年级，“六一”儿童节这天一早就去坐车玩儿。出发发胡同西口来到10路公共汽车站，等来了一辆挂着长方纸牌的“儿童车”，我就和众多孩子一起挤上去。车开到总站南菜园停下。我和坐车的孩子本想再坐这辆车返回，谁知司机让所有孩子下车，说车坏了，要修。孩子们只好在总站车牌下等下一辆“儿童车”。结果久久等不来。那时的南菜园一带全是荒郊野地，孩子们傻站着等，兜里又没有钱，老不来“儿童车”怎样回家呀！我和等车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心里着急。有个年岁小的孩子已经吓哭了。好在那辆车修好了，又开过来进站，大家慌忙挤上车，回了家。中午吃了饭后，我已把上午坐车受到的惊吓扔到脑后。又跑到西单，挤上一辆挂有圆纸牌“儿童车”的有轨电车，环行绕了内城一大圈儿，过足了“车瘾”。那一天，从一早到天黑，差不多每辆“儿童车”都是“满载儿”。

北京市少年宫于1956年元旦在景山公园寿皇殿建成开幕。能到景山少年宫参加活动，是许多孩子感到高兴的事。这年“六一”儿童节，笔者上小学四年级，从学校领到一张票，去景山少年宫参加联欢活动。景山少年宫占地面积达5万平方米，建有一排排活动室和标准足球场、篮球场，还有一个大型儿童游戏场。我到景山少年宫后，先进到儿童游戏场玩儿。这里设置了秋千、荡木、转绳伞等健身器械，还有一架当时北京最高的滑梯，高10多米，登级上到顶部，可从天梯上滑下；梯架中心还立有一根粗钢管，胆大者可手脚攀住钢管，一溜而下。我在游戏场玩了一番，进入大操场观赏了解放军体工大队运动员的表演，节目有爬竿、叠罗汉、伏虎（滚铁轮环），还有三轮摩托车行进中翘起一轮换轮胎、穿越火网等。接着又观看了一场足球赛。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儿童节。

北京老报刊多集西城

□ 高文瑞

老北京的报刊有一个现象，大多聚集在西城区。据《北京市宣武区志》记载：这里自辽以后，印刷、造纸等相关工业已经达到一定水准。文化氛围浓厚也是一个原因。众多的文人雅士居住在这里，群贤荟萃，有宣南士乡之称。

明代的《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它是由通政司负责发行的朝廷公报。内容包括诏令、奏章、皇室动态和官吏升迁等。《邸报》只在统治机构内部发行，普通民众是看不到的。到了明末，在京城民间开始出现手抄本的《邸报》。崇祯十一年（1638）改用活字印刷。清代，由军机处承担抄录并转发六部和在京各衙门的公告。后来，名为荣禄堂的南纸铺取得了承印、发售的特权。地点就在地处西城区的铁老鹳庙胡同，即现在的铁鸟胡同。道光年间，《邸报》改称《京报》。一些贩报的山东人，在前门外设立报房，包揽《京报》的发行。京城有固定字号的报房达十余家。较为有名的有聚兴、聚恒、聚升、集文、同文、合成、信义、公兴等。这些报房大多集中在南柳巷。《京报》改为日刊，发行量最多时能达1万份。内容分为“宫门抄”“上谕”“奏折”三部分，基本是经过批准的官方公文。这与现代的报纸有本质的不同。随着朝代的更替，《京报》也就消亡了。现存清代的《京报》多为7至10页的小册子，用竹纸和毛太纸印刷。

而现代人比较熟悉的《京报》则是另外一张报纸。它与我们的烈士紧密联系在一起，那就是邵飘萍。1918年10月5日，《京报》在北京前门外三眼井38号诞生，后又迁到了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最后，邵飘萍集资把报馆建在了魏染胡同30号。这份凝聚着邵飘萍心血的大型日报一问世，即体现出敢讲真话的大无畏作风。在题为《本报因何而出世》的发刊词中，邵飘萍写道：“民国以来，军阀所为者俱为祸国病民，今则必

须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除之！”同一天，他还在编辑部亲手书写了“铁肩棘手”四个字。这取自于明代杨继盛临刑诗句“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中的四个字，与报社同仁共勉。

魏染胡同在北京历史上也算是小有名气。它得名于明代一普通魏姓染匠，却出名于一批文人、士绅。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清代文人查慎行等都曾寓居于此。《京报》馆是一栋灰色的两层西式小楼，分上下两层，各七间，门楣正中的青砖上，镌刻着邵飘萍手书的“京报馆”三字。邵飘萍，名新成，字振青，号飘萍，学名锡康（后改作镜清）。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东市街芝英考寓（现樵楼巷）。早年，他曾作为一名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志士，活跃在南方新闻舞台上。在《京报》，他熟练地利用手中的一枝毛锥，奋勇拼杀，反对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冲锋陷阵。1925年春天，由李大钊、罗章龙二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京报》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中名噪一时，主要得力于两个方面。一是迅速、准确的新闻报道与旗帜鲜明的原则立场，二是经营得法。“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这是邵飘萍常讲的一句话。由于注重依靠社会力量办报，注意经常革新版面，在标题、新闻、评论等方面下工夫，不到一月，《京报》的发行量从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6000份。这在当时北京是首屈一指的。报纸除日出两大整张外，还先后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鲁迅就是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众多名篇，如《灯下漫笔》等杂文、小说在此发表。“五四”运动前，邵飘萍与毛泽东还有过交往。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

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遭到奉系军阀政府特务的围捕，两天后即英勇就义，年仅40岁。邵飘萍死后，尸体被刑吏装在薄板材内，埋在崇文门外义冢，前面插一根木牌标志，写着“邵飘萍墓”字样。第二天，将棺木挖出启开，邵飘萍脸部被枪弹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亲友将血迹擦净后停入殡仪馆。马连良等友人帮助，在城外搭起开丧凉棚，举办了丧事。反动军阀闻知此讯，扬言要开棺碎尸。急忙中，尸棺被连续转移，最后埋于天宁寺旁荒地。对于邵飘萍掷地有声的文与人，冯玉祥将军做过这样的评价：“飘萍一枝笔，抵过十万军。”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是共产党1922年9月到1927年7月的政治机关报，它实际上是一个周刊。主编蔡和森，编辑有高君宇、陈乔年等。印刷厂设在今广安门内大街广安西里5号，以承揽市民印刷品为掩护，并通过民信局和铁路局，将《向导周报》发往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通过党刊《向导周报》对孙中山幻想利用军阀力量、企图从军事投机中取得胜利的的错误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只有仿效前苏联，建立革命军队，革命才能成功。如1922年11月《向导周报》第9期在《国民运动、革命和革命宣传》一文：“只是时常依靠别的有力分子对它的感情为转移，那些有力分子昨天还是他的朋友，今天能够翻脸，明天或成仇敌。”前苏联“坚强的红军能够组织成功，便因为有真正革命精神。……红军是一个真正革命的军队。”

而另外一张在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就是《每周评论》。《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为了加强对旧文学、错误思潮的攻击力，同时着手新文学自身的正面理论建设。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倡议下，《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创办，并在米市胡同设立发行所，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政论性刊物。《每周评论》采取小型报纸的形式，每周日出四开一张，分四版，内设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国内

劳动状况、评论之评论、名著等栏目。密切关注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并及时地加以报道和分析。陈独秀在《发刊词》里写道：“《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元旦正好逢出版《每周评论》第二期，李大钊写了一篇《新纪元》社论，提出“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

《每周评论》创刊后，正值国际上即将举行巴黎和会之际，该刊发表了大量的时评，对这次“和会”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五四”运动爆发后，该刊从第二十一号起，连续5期用全部或大部的篇幅详尽地报道和评论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的进展。在时事报道和评论中，《每周评论》伸张正义，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在动员民众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中起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每周评论》曾摘译发表过《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从此，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狭小、时间短暂，但已暴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的改良。这场论战，在“五四”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由于《每周评论》以犀利的时评，抨击旧政府，宣传新思想，1919年8月在出版第三十七号时被北洋军阀政府查封。

历史上曾有两份同名的《万国公报》：一份是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刊，以传播西学、新学

为主要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的内容。其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简称《教会新报》）。另一份则是1895年8月，由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出资，在北京南海会馆，即今米市胡同43号创办的，后来改为《中外纪闻》。报纸为双日刊，每期10页，内容上有上谕、外电、各报选录、译报、评论等。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用此报纸，介绍《马关条约》签订中，清政府官员的腐朽无能，分析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在鼓动舆论、宣传维新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报上的文章大都出自梁启超之手：《地球万国说》《通商情形考》《地区万国兵制》《万国矿务考》《铁路通商说》《铁路工程说》《佃渔养民说》《农学略说》《农器略说》《铸银说》《西国兵制考》《报馆考略》等等。次年1月，《中外纪闻》被清政府查封。它被取缔的原因很简单：这不是一份一般的报纸，这是一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

《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史》一书中写道：“虽然，从19世纪初就有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大陆创办了中文报刊，但毕竟不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刊，称之为中国近代报刊似乎稍失严密。而以艾小梅、容闳、王韬等人为首创办的第一批中文报刊，则不是势单力薄就是远离大陆，故难以从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作用角度来认识。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报刊产生的实质性标志应是康有为等人于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中国大陆最早的政论性杂志《中外纪闻》。”

《北京女报》是一份很有特点的女性报纸，由张展云母女于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即公历1905年8月20日在前门外羊肉（今耀武）胡同创办，是反映中国清末新女性心声最早期的报刊。该报“以提倡女学妇德为宗旨”，颇受妇女

界的欢迎。报刊纸质脆薄又经百年沧桑，为世人少见。它报道过社会新闻，如出洋大臣启程的消息，王府防备刺客的报道；以《冤哉枉也》为题，报道了萨荫图的内弟在火车站被炸弹炸死；还有《调消防队守颐和园》：现在那中堂又把内城消防队调到颐和园去，看守围墙，这都是格外慎重的意思。同时，还有谈家政学方面的内容，教的是治家之道。比如省靡费，谋生路，保平安，都是治家顶要紧的事情。作为女性，要打算起家，非学此不可。古人说：国里有善政，一国可以太平；家里有良法，一家可以平安，一点儿不错。报纸还有气象的新闻。《好大雹子》：朝阳府南边，十七十八两天，忽然下起极大的雹子，也有像鸡子大的，也有像拳头大的，也有像饭碗大的，顶大的像盆子大。一会儿功夫，庄稼是一点没有了，砸坏了房子十几间，伤了牛羊七百多只。至于伤了人没有，现在还不知道。此外还刊登个人演说、小说、笑话等，可读性很强，很好看。

类似的报纸杂志还有很多，如《京话日报》《大兴日报》《共和民报》《北京日日新闻》等，听其名就能了解它的内容之多。还有一些著名的报刊如《大公报》在永安路，《晨钟报》在菜市口胡同等。有趣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像《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一些“老牌”的报纸，就连最近几年人们熟悉的《北京晨报》《新京报》等一批“新秀”都能在此地的历史尘封中找到它们的名字。

解放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也先后有一批传媒入驻原宣武区。据《北京市宣武区志》统计，宣南至今已有300多家报章杂志在这里编辑、出版、印刷、发行。如今，菜市口迎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此办公，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崇圣寺历史文化浅探

□ 史可非



图一：《重修崇圣寺碑记》

“崇圣”，即“崇奉神圣”，满语读作“enduringge be wesihulembi”（将神圣者来尊崇）。“崇圣”为我国古代寺祠坛庙的常见名，惟所崇之“圣”具体有别，如大理的崇圣寺（佛祖）、历代帝王庙内的景德崇圣之殿（中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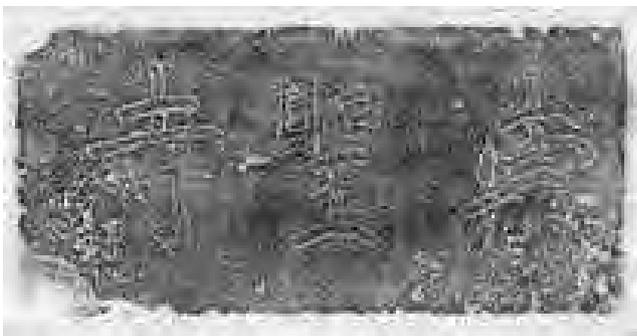
先王）、国子监中的崇圣祠（孔子）等。北京地区以“崇”字命名的寺院极为普遍，仅在今西城区境内即可见崇效、崇寿、崇兴寺等，但以“崇圣”为寺名并保存至今者目前仅见西城此一家。崇圣寺在1999年北京市文物普查工作中被确定为新发现文物、列入文物普查登记项目（有价值文物保护单位）名录，2006年曾入选第二批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推荐名单但未定保。由于崇圣寺相关文献史料不丰、又长期作为办公场所等原因而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与注意，至今未见相关（包括寺北紧邻的断魂桥）研究成果问世。作者在查阅文献及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试撰此文，旨在抛砖引玉，使西城区内这处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受到更多地关注与更好地保护。

一、立寺年代

崇圣寺为紧邻皇城的一座小型寺院，位于今西城区西黄城根北街45号（原皇城根1号）。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文物地图集》等文献中首先可见以下记述：

161-C123 崇圣寺[西黄城根北街45号·清代] 始建年代不详，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修。寺坐西朝东，原有山门一间；前殿三间；中殿三间及南北配殿各三间，南北配庑各四间；后殿三间带左右朵殿各二间，南北配殿各三间。现基本保持原建格局。

国家图书馆现存一份长61cm、宽29cm的“明万历二十五年甲辰月尾有乾隆六年孟秋刻款”崇圣寺门额拓本文献（北京第10590号，图一）。尽管该碑刻文献年代与本文考查对象大致相符，但依据“平谷区韩庄镇洙水村”这一地点信息可以排除其为本文研究对象遗留物的可能，因在平谷与其它区县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目前均未查到同名寺院的任何信息，故初步推断这座“崇圣寺”现已无存。



图二：国家图书馆藏崇圣寺门额（1597年、1741年）

根据国家图书馆所藏《重修崇圣寺碑记》拓片文献（北京第409号，图二）内容可知，寺院“盖前明创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修，竣工后由李云岩撰文、正蓝旗满族人扎尔杭阿（按满语语音规则为Jarhangga或Jalhangga，国图文献信息误作“机尔杭阿”）正楷书丹立碑（图二）。碑文如下：

西安门外右距百武有崇圣寺，盖前明创建。供奉关圣帝君像也。迄于今百有余年，虽几经修葺，不过小小补塞其罅漏而已，终难免栋折榑崩之患也。己酉春兴工建造，住持了智师徒等心贵经营，力动憔悴，感金僧之呵护，藉善信之输诚，基址仍旧，未有更新，巍巍乎至仲夏而焕然落成焉。予羁留殿侧，性嗜淡宁，慕叔和、仲景之学而心好之，盖亦有年矣。目睹废兴之由，因其所嘱而診之。且为之颂曰：缅维夫子，乾坤至正。率土之滨，其谁不敬。手执《春秋》，坐兴普净。非释谈空，神之化境。曰义曰忠，推之兆姓。悃悃求福，是乃有庆。藐而小儒，愚难测圣。于戏钦哉，即此是证。古越山门信士弟子李云岩恭撰，正蓝旗满洲弟子扎尔杭阿敬书。大清乾隆五十四年岁次己酉仲秋月谷旦住持僧了智、达通建立。

《重修崇圣寺碑记》碑额部分高24厘米、宽21厘米，篆刻“寸心千古”四字。碑文正文部分高94厘米、宽61厘米，共271字，全文叙赞结合，文风恭谨敬诚。作者目前尚未发现有关李云岩、扎尔杭阿相关的文献记载，从碑文内容与书法水平来看，两位作者应为崇仰关帝、具有较高



图三：“敕赐崇圣禅林”石额（1776年）

文化水平的满汉信士。

此外，乾嘉时代书画名家朱文震于“丙申”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为该寺书丹的“敕赐崇圣禅林”横幅石额（图三）保存至今。结合《重修崇圣寺碑记》记载的日期可知，《中国文物地图集》与《北京文物地图集》中所记崇圣寺“清乾隆四十五年”这一重修时间应订正为“五十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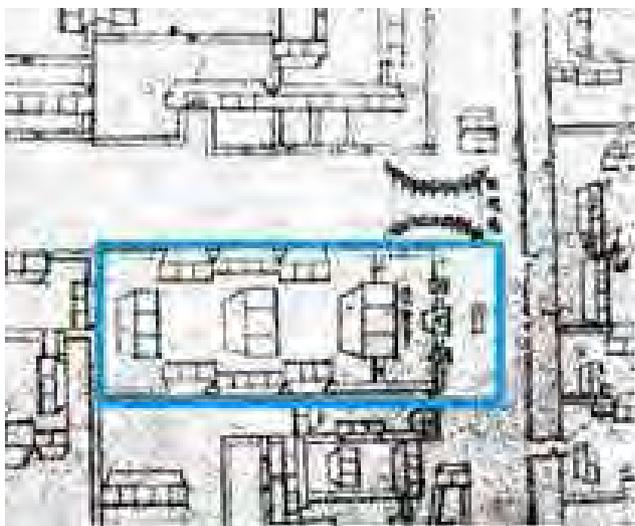
从现存最早的北京史地文献《析津志辑佚》一书中可见以下记载：

崇圣寺在咸宁坊，至元五年建。

在清代文献《日下旧闻考》一书中，崇圣寺被列入“存疑”部中，记述完全引自《析津志》。《宸垣识略》一书提供了稍为详细的记载：

崇圣寺在西安门外北城下，明建，有天启甲子年鼎一。本朝康熙间，户科给事中穆联重修碑。又明碑一，磨去，传是魏忠贤立也。

按《北京胡同志》、《北京市西城区地名志》等书所述，崇圣寺所在的西皇城根位于今西城区中部，街道呈南北走向，全长1,130米。明代因位处皇城根之西而称皇城西大街，属积庆坊。清代属正红旗地界，又称为皇城西城根、皇城根。通过检索《析津志辑佚》一书所录109座寺庙可知，除石窟寺在金西京大同之外，其余皆分布在大都新、旧两城之中。我们知道，至元四年（1285）元大都开始营建，今西四一带即位于当时的咸宁坊内。在不考虑周边存在同名寺院的前提下，就可将与《析津志辑佚》所记位置最近



图四：《乾隆京师全图》中的崇圣寺（1750年）

的崇圣寺的始建年代上推至元初。

二、香火兴衰

从清乾隆十五年（1750）绘制的《乾隆京师全图》（图四）中清晰可见，崇圣寺位于皇城西安门北侧，紧邻断魂桥，寺院坐西朝东，影壁、山门、殿房沿中轴线依次排列，可数殿房共29间，布局规整。从图中格局规模与建筑体量上看，属中小型寺庙，山门北侧街角宽大的建筑物即断魂桥。关于崇圣寺内的情况，《北京西城文物史迹》一书有以下记述：

关帝殿3间，木额“妙觉圆明”，署“嘉庆庚申清和月信士弟子白素、白维敬献”。玉皇殿3间，东、西配房各3间。供奉神佛像30余尊，内有石碑一通。崇圣寺铁瓶铸梵文字二。

原书未注明上述文字出处，从“供奉神佛像30余尊”这一记载结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实施的两次寺庙调查档案登记资料，初步推测上段文字与所配照片（同书第22页，图五）的年代应为上世纪30年代左右：

坐落西安门外北路西内四区皇城根一号，建于明万历年，私建。本庙面积约三亩，房屋二十一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管以便信仰烧香。庙内法物有佛神像三十余尊，大铁钟一口，殿鼓一个，铁五供四堂，铁香炉三个，铁磬四



图五：崇圣寺内供奉的关帝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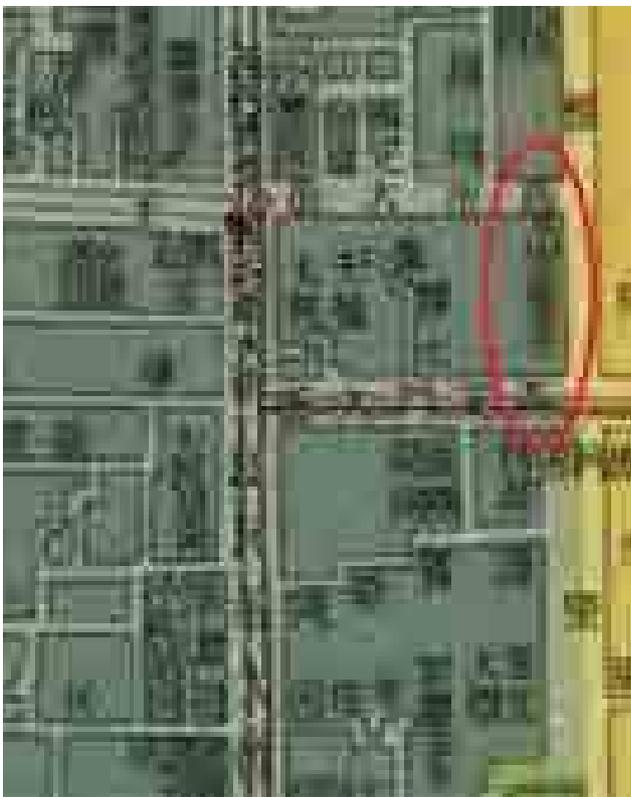
个，金刚经数部，木鱼一个，殿铜钟一个，殿铁钟一个，另有松树四棵，石鱼池一个，石碑一座。

坐落内四区西华（安）门外皇城根一号，建于明万历年，清乾隆十二年重修，属私建。不动产土地二亩余，房屋四十三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自行管理，佛殿及配房除供佛外，余皆出租。庙内法物有佛偶像二十七尊，神偶像四十六尊，礼器六十二件，另有石碑一座，松树、核桃树各两株，槐树、楸树各一株，椿树一株。

从档案记载内容不难发现，至1928年时崇圣寺仍保持香火，佛神像、礼器、经文尚存，但房屋数量有所减少。至1936年，寺内房屋间数已较前次登记时增加一倍，但除供奉神像以外的多余殿房此时均已外租，神佛像、礼器的数量也有不少增加。尽管崇圣寺在以上两次登记中都留下了详实的资料，但不知何故未被收录于同一时期全面辑录北京地区寺观的《北平庙宇通检》一书。上世纪30年代末，北平日伪当局曾组织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活动，崇圣寺也出现在当时调查对象之列：

崇圣寺，住持或管理人：性海，地址：西华（安）门外皇城根一号，僧侣数：二。

因在1941年出版的十卷本《故都变迁记略》第六卷中可见“崇圣禅林在西皇城根”这一记述，据此推测，崇圣寺山门至上世纪40年代时仍保存完整、清代门额也未被卸下，故民间也称其为“崇圣禅林”。至1947年第二次北京地区寺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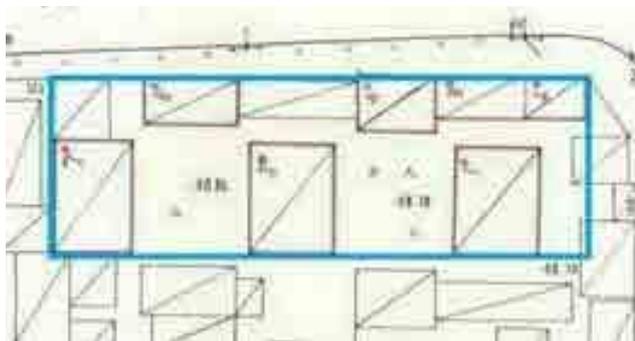
图六：《北京市街道详图》

总登记时，寺方仍按时向市政当局填报了相关信息：

庙名：崇圣寺，现任住持：立山，庙址：第四区西安门外皇城根1号，送表日期：6月8日。

根据此次寺庙统计结果可知，北平全市僧、道、尼、冠（道姑）及民庙五类寺庙总数已由1930年的1,734处、1936年的1,135处、1941年的783处降至728处，17年间减少近60%。寺庙总数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寺庙年久失修、无人经管，不少私建民庙逐渐废弃改为民居。从登记资料内容来看，崇圣寺此时仍有专人负责管理。

新中国初期，在1950年北京初版发行的《北京市街道详图》（图六）中，清晰标示着位于当时北京第四区内的崇圣寺。1954年元旦，“北京市佛道教寺庙管理组”（以下简称管理组）在广济寺成立，负责北京市内寺庙房产的管理工作。1956年，管理组增设西城、东城分组。1956年



图七：崇圣寺现存建筑平面图

夏，管理组办公地点由广济寺迁至崇圣寺（1960年又迁至广化寺），专门负责西城、东城、宣武、崇文、海淀、丰台、朝阳七个城区内五百余座寺庙房产的管理工作。1958年，管理组将管下一批寺庙交给民办集体工厂使用或捐让给小学与居民使用。其中，西城崇圣寺与无量寺（兵马司胡同）被管理组留作库房使用。1958年“大跃进”期间，“北京市宗教界联合学习委员会”还曾在崇圣寺召开成立大会（会址定于广济寺）。1958年至1971年，管理组陆续将包括崇圣寺在内的一批寺庙房产移交给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以租代管，崇圣寺在此期间也成为西城区房地产管理局的直管公房，后由北京市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支队六部口分队使用至今。

通过实地测量，崇圣寺现存建筑具体情况为：前殿（1#）共3间，面积103.5m²。北配房（2#、3#）共5间，间数与面积分别为2间、29.25m²，3间、41.4m²。中殿（5#）共3间，面积103.5m²。北配殿（4#）共3间，面积51m²。后殿（7#）共3间，面积96m²。北配殿（6#）共3间，面积50m²，殿房合计共有20间，建筑总面积474.65m²（图七）。与乾隆京师全图中的寺院原貌相比，可见原建东向三间山门及影壁已拆无存、北侧各配殿处已另改作大门、门道、传达室等使用，南侧原配殿处已建一座小二层砖混办公楼房，现存建筑均为硬山筒瓦屋面，但装修式样均已改动，格局基本保持完整。

三、小结



图八：崇圣寺、断魂桥与西四牌楼位置关系（1750年）

通过以上考查，试对崇圣寺特点归纳如下：

（一）建寺年代早

与大多数寺院不同，崇圣寺整体坐西朝东。除建寺时受方位条件制约（西安门大街东端路南拐角处）与其它客观因素外，这种朝向特点或与我国历史上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在建筑格局上喜尚东向的“朝日”风俗有关，这一点也见于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什刹海寺。结合《析津志辑佚》记载推测，崇圣寺存在元代始建，明代续建，清代重修这种可能性。

（二）香火保持久

从建筑规模与主奉神祇来看，崇圣寺为一座中小型的“道庙”，最初崇道而后逐渐奉佛。这类寺庙也称为宫或观，释道混同的特征明显，虽然也会将弥陀、观音作为本尊祭祀，但主奉神祇为玉皇大帝、关圣帝君，有时会为玉皇配列天官、地官、水官三神奉祀，为关帝配列佛爷、龙王、火神、马王、牛王、财神、药王、神农、狐仙等奉祀。这些特点从崇圣寺内曾保存相当数量的神佛像以及各类法器、礼器、经文的档案记载中已经得到印证。从资料可见，崇圣寺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一直有专人管理寺务，香火保持时间很长，但从30年代房屋外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外部社会不断介入寺内生活及寺院日渐衰败的端倪。作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崇圣寺曾被老百姓称为周仓庙，一位幼年时经常到寺中的老先生还告知作者50年代时殿内尚存少量泥塑神像。

（三）地标价值高

崇圣寺介于西安门与西四牌楼之间，除方位耐人寻味，寺址也值得探讨。首先，在皇城西侧建寺应有崇奉神明护城佑民的初衷。其次，寺墙

紧贴断魂桥，影壁与桥东位于同一垂直线，山门与桥心位于同一垂直线，桥西正对四牌楼（西市）。西四牌楼在明代时为罪犯斩首的刑场，崇圣寺正位于出西安门北去刑场的必经之路上，断魂桥应为进入刑场的一个信号标志。而在桥下建造一座崇奉关帝的寺庙很可能是出于震慑、阻挡亡魂东入皇城的用意。清朝定都北京后，八旗分驻内城，崇圣寺所在地区为正红旗三参领十五佐领居址，刑场移至宣武门外菜市口，断魂桥显然已无“镇魂”之用，成为一座普通路桥，但崇圣寺却一直保留下来（图八）。时过境迁，如今这一地区内的断魂桥、西安门、崇庆寺等古迹已湮灭于历史，唯独崇圣寺得以幸存至今，不仅是皇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重要遗存，也是北京内城历史发展的一处宝贵实物见证。

综上所述，崇圣寺除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外，还是新中国首都宗教事业发展的亲历者与贡献者，具有一定的时代纪念意义，直到今天还在为首都社会生活发挥着作用，应给予更多的重视与更好的保护。作为文物工作者，今后还要不断发掘、研究其文化内涵，探索更科学的利用途径。

永远怀念葆玖先生

□ 刘嵩崑



人物顺序由右至左依次是：
福芝芳、梅葆玖、梅葆琬、梅宝玥、梅葆琛、梅招武

我受老辈儿影响从小就接触戏曲，因为在旗，家里不许学戏，但我不到四岁就进剧场听戏，从看戏、迷戏、学戏、演戏，一直到写戏，可以说我这一辈子是爱戏如命，著书有《京师梨园世家》《京师梨园故居》《京师梨园轶事》。

梅葆玖先生比我大三岁，我属牛的，他属狗的。算起来我们俩认识有30多年，2016年4月25日11时病逝，我怀着万分的悲痛之情在我腾写的160位老艺术家签名扇的花名册上将“梅葆玖”三个字圈上黑框，已仙逝达120多位，我是多么不情愿地圈黑框呀！我因哮喘在医院输液未能送梅先生最后一程深感遗憾。

梅葆玖出生在上海思南路的梅宅，他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第九个孩子，代表作《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太真外传》《洛神》《西施》等。梅先生10岁开始学艺，13岁正式登台演出《玉堂春》《四郎探母》等剧，

18岁开始与其父同台演出。国家一级演员。1989年，获美国纽约林肯美华艺术中心授予的亚洲杰出艺人奖；2009年被世界艺术家协会授予“艺术大师奖”和“终身成就奖”；2011年1月11日，获中国京剧终身成就奖；2012年4月20日获“世界和平大使”奖章；2015年1月获第15届华鼎奖终身成就大奖。

梅葆玖一生致力于梅派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京剧界标杆式的人物，他多年来培养了一大批艺术传人，其中有十几位弟子现都已成为了京剧家。

我与梅葆玖相识30多年，现在回想起与他的往事，找出合影及赠送的照片、戏单，见物思人，真是感慨颇多。

初识梅葆玖

梅兰芳祖居在西城李铁拐斜街45号，今为铁树斜街101号，1951年梅葆玖跟父亲从上海回到北京，就住在西城的护国寺，“文革”以后就搬走了，结婚后住在干面胡同。所以说，梅葆玖住在东城，根在西城。

由于我自幼爱戏，对梅兰芳、梅葆玖也是仰慕已久。我们是通过修理电唱机相识的。

30年前，即“文革”时期，改唱现代戏，梅葆玖等于失业了，没事儿了。但他相当聪明，喜欢研究电器，碰巧我的电唱机坏了，就托我一个朋友北京京剧院武生沈宝桢，问能不能让葆玖给我修一下，他说没问题。就这样，直到送修机器，机器修好回来我这儿，我们俩也没见面。后来因为我常看戏，那时候某些场合就接触了，逐渐逐渐就熟了。

梅葆玖先生为人谦逊，好接触，他的为人处事，遗传梅家祖风，从曾祖父梅巧玲开始，就一贯对下边人和气，善待同仁，谁有困难都给予帮助，其父梅兰芳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梅葆玖好



一九九一年二月二日，隆福寺医院于“冶金部”礼堂举行联欢会，会后与梅葆玥、梅葆玖合影

钻研，所有的电器的事儿，什么汽车摩托车，他什么都能鼓动，经常帮助邻居、朋友。平时他出入都是骑自行车，也跟普通人一样，一点儿架子没有，没有因为父亲是梅兰芳，自己是角儿，就瞧不起别人。

签名赠照

梅葆玖对于签名、合影的要求从不会回绝人家，有时在某种场合，人们把他围起来了，那就签个没完没了，他也不烦。葆玖总是说：我不能够扫大伙儿的兴，人家让我签名是看得起我，难得碰见有这么个机会，我何必扫人兴呢。就是合影，他也是认真对待，决不能衣着随意，一定会衣帽整齐，郑重其事地跟人合影。

我们见面，他也总是赠我签名剧照。一次梅葆玖骑自行车外出办事，我们于美术馆后大佛寺东街相遇，他约我到干面胡同30号小楼做客。梅葆玖由于工作原因，睡得晚起得晚。我头一次去的时候，太早了，人家没起呢，用戏班的话，我“冒场”了。家人把我让到客厅，我就耐心等着，我也不好意思乱走动。心想，人家信任我，我也不能没礼貌啊。见面后我送他两件礼物，一个是他年轻时候的剧照，那时候还称他梅先生呢，梅葆玖很高兴，说这挺珍贵，我都没有，真的！第二件礼物是《梅兰芳东游记》。梅葆玖赠了我名片及《太真外传》的签名剧照。以后多次见面和到访，观看演出和参加收徒仪式，梅葆玖均赠送签名剧照并合影。



与梅葆玖新收徐娜三人合影（梅兰芳大剧院）

1991年，我同事赵士奇的母亲找到我，说想和梅葆玖照一个合影，我说这问题不大。梅葆玖欣然同意，还专门找了个隆福医院在东四冶金部礼堂开联欢会的机会，让我带着同事的母亲来合影，老人家非常高兴，既听到戏了，还见到梅葆玖本人，后来老太太放了一个大照片挂着，谁去就跟谁念叨合影的事儿，颇有自豪感。这么一件小事，梅葆玖也放在心上，绝不凑合，敷衍了事，说明他待人真诚，平易近人。

赠送戏单

我喜好收藏戏单，所保存的大多是50年以后的，经历了“文革”，可以说它们是劫后余生。我最多时候一年要看200多场戏。我将戏单分类整理，一张纸一张纸地对着灯亮，点一点儿小浆糊，粘上。边儿不齐，我画出线来裁，然后再订成书。但是那也不是我看的所有戏。看完戏，我就留着将来翻翻，好似又过一遍戏瘾似的。

我所留的基本都是我自个儿看戏保存的，有的是别人送给我的，比如出国的、中南海演出的等等。

有一次我听说梅葆玖准备去日本演出，就请他方便的话给我留一本戏单。这样的要求葆玖先生都不会推辞，并认真对待，记心里了。演出回来后，梅葆玖在戏单上给我签名留念。很多小事都说明梅葆玖对人诚恳，是个可交的朋友啊。

梅葆玖有一个师姐陈正薇，1947年拜的梅兰芳，是南京的。有次她有一个来自镇江的徒弟



梅葆玖所赠作者剧照

高丽珠到京，听说我与梅葆玖熟识，请我带着去拜见拜见。梅葆玖听说后马上安排时间，热情接待，还合影留念，请我们看戏还赠送了照片。后来我说想带他们到护国寺梅兰芳纪念馆看看，梅葆玖非常高兴：“行，我跟他们说一下。”我们一行在纪念馆看到了梅兰芳当年的写字台，我坐下想照张相留念，服务员过来说这儿不能照。这时馆内一位负责人过来说，没关系，这是梅先生关照过的，可以照。当时我并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但万万没想到，梅葆玖连这样的小细节都考虑周全。

自2007年下半年，我身患哮喘，不宜骑车，若坐公交车下车步行干面胡同梅家小楼就会喘。梅葆玖也工作繁忙，我们交往就少了，最后一次去干面胡同是我要送梅葆玖四本书，我到楼下打电话，梅葆玖说下午有一个电视台采访，问是否可以晚上来。因为是老朋友，我就没有客气，说你也别睡了，我已经在门口了。我们见面后，梅



梅葆玖所赠作者剧照

葆玖还送了我梅兰芳纪念馆的明信片，是五张连折的，其中梅氏父子便剧照各两张，另张维纪念馆照，非常珍贵。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参加的活动是2012年10月14日在通州潞安镇泰和俱乐部参加菊声社成立七周年的庆祝活动，吃饭间隙他还不停地为他人签字、合影。

梅葆玖幼年学艺得益于王幼卿、朱琴心、陶玉芝、朱传茗等京昆名家，为其青衣、花旦、武旦和昆曲戏打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梅兰芳仙逝后，他的老搭档张蝶芬、贾世珍、姜凤仙、徐元珊等都成为梅葆玖的良辅善弼，使梅派戏得以传承！梅葆玖一生收徒大概有50多个，有几个我是参加的，在和平门烤鸭店收张馨月为徒、在政协礼堂收邓敏为徒、在梅兰芳大剧院收谭娜为徒等等。

梅葆玖为人非常低调，一张名片只印着“梅葆玖”三个字，不加任何头衔，他不喜吹捧，对称“大师”极为反感，总说自己是个演员，是个干活的。梅葆玖忠厚恕道，乐于助人，扛起了梅派传承的大旗，一生为之努力，我失此好友，深感痛心，梅葆玖曾这样评价我的新书“《京师梨园故居》以500余张珍贵图片记录了100位名伶及其故居的影像，许多房舍今已不存，是这部书稿及时为后人保留了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正是有了他的鼓励和帮助，我要继续发挥能量，把国粹的戏曲史料记录下去、留存下去。

鲁迅先生在绍兴会馆的日子

□ 陈光中

众所周知，“周树人”和“鲁迅”是同一个人，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从“周树人”变为“鲁迅”，其间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他在初到北京的那几年里完成的。实际上，在他的一生当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

周树人离开绍兴到南京教育部就职后不久，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达成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而由袁世凯接任，政府地点被定为北京，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需转往北京工作，周树人也是其中之一。

有意思的是，《鲁迅全集》中收入的鲁迅日记，是从1912年5月5日开始的。尽管他的日记往往十分简略，但却相当准确地记述了他的具体行踪乃至细微的心态，是难得而可靠的资料。

1912年5月5日上午11时左右，周树人所乘的轮船抵达天津，然后换乘下午3时半开行的火车，晚上7时左右才到北京的前门火车站，130来公里的路程，居然走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春季的北方平原，并没有给他留下任何令人愉悦的印象：一片死气沉沉的黄土，间杂着稀疏的几棵树木，“无可观览”。

已是入夜时分，他只能暂时在骡马市附近的一个小店住下，但还是抓紧时间去了一趟绍兴会馆，一方面拜访同乡故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联系落实一个长久的住处。明清时期，各地在北京城里设有许多会馆，以便为在京谋事的同籍乡人提供一个居住及聚会的场所，城南宣武门外一带是会馆较为集中的地方，绍兴会馆便是其中之一。这里原来是浙江山阴、会稽两县共有的会馆，于清朝道光年间由这两个县在京城供职的官员出资修建，起初称为“山会



北京绍兴会馆大门（2011年1月）

邑馆”，后来山阴、会稽合并为绍兴县，因此改称“绍兴会馆”。会馆里住的毕竟都是同乡，总是要方便得多。因此，第二天上午周树人就迁到了会馆里。

南半截胡同是南北走向，会馆在胡同北端，大门朝东，早先门两旁卧着一对鼓状门墩，门额上悬着写有“绍兴县馆”四个大字的木匾，那字出自魏龙常笔下，据说这魏龙常还是周树人父亲的朋友呢。会馆门面虽不算大，但进去后便可发现规模不小，纵横数进院落，大大小小的房屋有80多间。进大门绕过影壁，正对着的前厅是供奉先贤牌位的仰载堂，后厅是供奉文昌魁星的晞贤阁，院内其他的大部分房间则是供乡人居住的。周树人被安排住在会馆西北侧名为“藤花馆”的第二进院子，坐西朝东的一排屋子里。安排好住处以后，他才搭骡车前往位于西单南大街的教育部去报到——那时骡车似乎是北京城里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

周树人搬进绍兴会馆的那天是1912年5月6日，一个很普通的日子。他对这一天最深的记

忆是彻夜不得安眠，因为床上饥渴多日的臭虫终于有了饮食来源，难免蜂拥而至，“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蜚虫三四十”，以致他不得不赶紧逃到桌子上“以避之”。第二天让会馆的杂工换了床板，才得安睡。

那杂工被称为“长班”，60来岁，资格已经很老了，对会馆里的事情了若指掌。当年，周树人的祖父周福清在京任内阁中书，也曾在这里住过，后来娶了姨太太，便另寻住处搬出去了。老长班有些饶舌，常对周树人说些有关老太爷跟姨太太打架的故事逗趣，但在周树人听来却很不受用，只能有意拉开些距离，以求耳根清静。

初到北京，部内工作尚未安排就绪，加上复杂的政治因素影响，往往无“公”可办，每天只是闲坐而已。刚上了三天班，周树人就有些烦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好在有时可以外出考察，看看新剧、走走公园、视察一些古迹，也算是奉公办事了。然而，时间刚刚过去了两个来月，政局就发生许多变化。仅以教育部而言，总长蔡元培因痛恶袁世凯的勃勃野心而断然辞职。周树人深为惋惜，数次前往蔡元培家中探访，挽留无效，只能含痛作别。恰在这时，他收到弟弟周作人从老家的来信，说范爱农不慎落水身亡。得此消息，周树人极为震惊。几个月前他离乡前往南京的时候，范爱农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后来又被排挤出学校，只能在熟人家寄食。周树人到京不久便接到他托求谋职的来信，但一时难有机会，没想到他竟会突然辞世！周树人不能不想到，范爱农也许是因绝望而自杀的。

在为蔡元培饯行的酒席上，百感交集的周树人忍不住借酒消愁。夜归会馆后，他迟迟难以入睡，徘徊于斗室之中，缓缓吟就数行诗句，既为悼念亡友、惜别挚交，更是为宣泄郁闷的心情：

……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

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时值炎夏，他却心寒如冰。是随蔡元培一同辞职，还是忍气吞声继续留任？思前想后，他最终还是留下了。

时隔近百年，当笼罩于鲁迅头顶的光环逐渐消失之后，此事曾为后人诟病，认为鲁迅依附袁世凯苟且偷生，实属“软骨头”。如此批评，未免有失公允。且不说当时的周树人正处于意志消沉的状态之中，无心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即使他立场鲜明地毅然选择辞职，结果又能怎样？就连蔡元培离京后也为生计所迫，竟不得不申请出国留学——卸任的教育部长要求外派公费留学，让教育部实在为难，最后同意为蔡元培拨用留学生费，但名义上不叫“留学生”。如此，蔡元培才得以携眷前往欧洲，入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学习。蔡元培其时已是45岁的“高龄青年”，这般“留洋”经历，可算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奇事！

周树人没有蔡元培那样的资历和魄力，因为还有一大家子人眼巴巴地等着他养活，一旦辞职便立即失业，如何承担资助兄弟、赡养老母的重任？范爱农的遭遇是前车之鉴，他怎敢贸然行事！

蔡元培为官廉洁俭朴，他在南京担任总长的时候，教育部全体人员，不分等级，每月一律只给30元的津贴；到北京后，周树人每月的津贴仅为60元。虽不多，但起码可以据此贴补家用了。所以，尽管世事浊恶，他却无法像蔡元培那样一走了之。

可见，我们在评价前人的时候，不应过于苛刻——毕竟“生存”是最重要的前提。

蔡元培走后，新部长上任。8月21日，周树人被“临时大总统”任命为教育部“佾事”，26日，又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教育部有所改组，风气未见显著变化，“俸银”却陡然增加了不少，每月居然有二百多元，虽然难以获取全额，时常仅得半俸，也已经相当不错了。周树人每次拿到俸银，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邮局。他要给二弟在日本的岳父家寄钱——周作人虽然去杭州的教育部门工作了一个多月、挣了90元钱的薪水，却又因为妻子分娩而返回家中，自己无法养家，只能依赖哥哥；他还要给绍兴的老家寄钱——他是老大，奉养老母及“家眷”的开销自然主要靠他承担。此外，他还不忘给弟弟们寄去他们需要的书籍、资料等物品，还时常给家里买些蘑菇、果脯之类的北方特产。

当了“部老爷”以后的周树人对“做官”谈不上毫无兴趣，也谈不上很有兴趣，只是认真地做那些似乎应当做的事情。正式“做官”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与几位同事一起设计“国徽”，他负责撰写文字说明，也做得很认真，那“说明”的内容有十二章之多。

根据分工职责，周树人所在的社会教育司主要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筹建，美术、文艺、音乐戏剧方面的指导，古物的调查与搜集，动、植物园的管理指导等等。他白天或到部里上班，或在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举办的“夏期讲演会”上讲授《美术略论》，或为筹办博物馆、图书馆而视察馆址，或参加一些会议等等。除去这些，业余时间还算是比较空闲的。晚上则是会会朋友，时常到距会馆不远的广和居饭馆聚餐。广和居是北京城里有名的老店，就在南半截胡同北端，是一座以南方风味为主的饭馆，虽蜗居陋巷，却盛名远扬，由于四周会馆林立，因而成为文人学士会友宴客的理想地点，当年周树人的祖父就曾在这里设宴待客。

若逢周日，周树人则走得远一些，或去西郊的万牲园，或游南城的陶然亭。最常去的还是琉璃厂的书店，他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要在那里盘桓半日，有时下班早一些也去逛逛，在那里，经常可以购到几本喜欢的书。还有的时

候，他到前门外观音寺街的青云阁去理发，或到在同一条街上的升平园浴池洗澡。但从日记上看，他大概两个多月才理一次发，而洗澡则更是敷衍，有时三个多月才洗一次澡。如此疏于洗理，在外表上一定会给人以不修边幅的印象，他那短发如戟的“刺猬式”发型，从在绍兴的时候就保持了下来，想必就是为了免去需要经常理发的麻烦。

独居京城，难抑思乡之情。中秋之夜，周树人与几个朋友喝了些酒，至夜深方才返寓，仰望晴空，“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那一丝痛楚的惦念缠绵于心，让他无法入眠。

1912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格外早，刚进十月，一场风接一场雨，日渐寒冷。对于来自江南的周树人而言，这种阴冷的天气实在难以忍受。在他的日记里不时可以见到“午后雨止而风，益冷”“今日特冷”“下午微雪”“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簌乱落如雨”……到了十一月，愈加难耐：“大风，冷甚，水冻，入夜尤甚。”会馆住舍里那薄薄的窗纸，挡不住如刀似剑的寒风。一向疏于衣着的周树人赶紧置办了一些御寒的衣物，并把门上的竹帘换成棉布幔子。另外还特地买了一个小小的白泥炭炉，拾几块木炭燃着，屋中总算稍许有些热气。

藤花馆的北房中，原先住着几位福建的客人，始终喧闹得很，时常彻夜嘈杂，“至夜半犹大噪如野犬”。有时周树人实在忍无可忍，大声怒斥，方稍有收敛，但隔不多时又依然如故，让他毫无办法。所幸进入冬季后他们居然搬走了，不仅使院里大为清静，更重要的是把朝向较好的房间腾了出来。周树人与会馆的长班商量了一下，请工人稍加糊裱，自己便迁了进去。这里阳光较为充足，又很背风，要比原来的住处暖和了不少。晚上燃起白泥炭炉，沏一杯热茶，伴着温红的炭火，在摇曳的油灯下翻翻从琉璃厂买来的古书，抄写一些碑帖，静下心来做些学问，倒也安然怡然，暂时得以忘

却旅人之苦。

作为习惯了单身生活的周树人来说，吃饭依然有些敷衍。部里的工作时间很松散，按照他的老习惯，早饭仍是不吃的；午餐一般都是与三两同事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对付过去。晚上若有朋友来访，便去外面的饭馆“改善”一顿，去得最多的还是那“广和居”，但也并不敢奢侈，常叫些价钱便宜的小菜，再来壶浊酒，也就可以了。其他时间则多在会馆里托长班代办，那粗糙的饭食实在难以下咽，以致时常腹痛，彻夜不止。独身在外，最怕的就是生病，他只得硬撑着无力的身子去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看病——自从父亲被庸医治死后，他再不相信那神而又玄却难见医效的中医，有病总是去看西医的。经检查才知道，不仅胃病又犯了，还得了气管炎。于是一连数日，他只能喝些稀粥；实在饥苦难耐，便去买些不伤胃的山药蒸食。过不多日，又患感冒，头痛鼻塞，体虚身寒，也只有躺在床上捂着棉被硬挺过去。

那个冬天的确是十分难熬的。孤独，寂寞，苦闷，像无法摆脱的幽灵一样始终伴随着周树人，使他的心情日渐压抑。

元旦到了。他独自枯坐房中。环顾四周，到处都是散乱堆放着的书籍。一年来唯一的收获是买了不少喜欢的书，他有年终清点书账的习惯，那也是百无聊赖之中难得的一丝乐趣。到北京八个月，书竟买了三百多册，连他自己也有些吃惊，不禁感慨不已。处于如此浊世，真不知读书还有什么用！有钱有权者要么视书如粪土，要么当作古董供起来以备夸耀。只有像他这样的书呆子才会把这些破书当宝贝，实在是可笑可叹！

周树人在绍兴会馆居住的那几年，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

1912年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革命政权与袁世凯议和。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南京政府北移，因此周树人才随教育部赴京。8月，宋教仁联合若干小党组成国民党，在首届议会中占多数。

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孙中山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遭失败。

1914年，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而黄兴等人因政见不同拒绝入党，造成革命党的组织分裂。

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发动护国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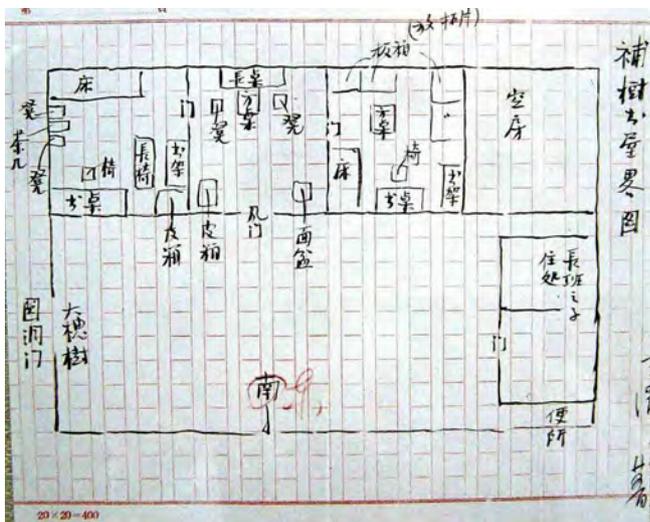
1916年，护国战争节节胜利，袁世凯于忧郁绝望中病亡，各路军阀依然混战不已……

刚刚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中国，就是这样又陷入连年的动乱之中。

刚过“而立之年”的周树人，当时正处于一生中情绪最为低沉的时期。

又是一个夏天来了。寂寞而炎热的夜晚，周树人默坐于院中的大槐树下，轻摇着蒲扇，从密密的叶缝中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当年初到北京时，同行的几位同事本也在会馆居住，但以后陆续接来家眷，便搬了出去，只有他一个人仍留在会馆，居然成了这里的老住客。因为藤花馆客人较杂，时常喧哗，他便于1916年5月6日搬到了这个院子里。这里名为“补树书屋”，与他的名字倒是很相投的。据说多年前在院中的这棵树上曾经缢死过一个女人，所以西房那几间屋子始终没人住；而会馆也由此特地规定，不准家眷及女人入住。周树人是学过医的，鬼神不惧，倒正好借此获得一份难得的清静。然而，长夜寂寂之时，他也难免觉得那屋子如同一座古墓，静寂阴暗，与世隔绝，死气沉沉。

独坐树下，往事难免浮上心头。12岁时祖父下狱，15岁时父亲病逝，17岁离家求学，21岁东渡日本……这些年他所经历的事情，大多让人沮丧、绝望。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他也曾欢欣若狂；随蔡元培的教育部来京，也曾想做一番事业。然而，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造就中国人的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满清政权虽然被推翻，终年战乱仍使百姓不得安宁，腐朽的官场更令人窒息。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在这腐朽



周作人手绘补树书屋图

中挣扎下去，但那悲凉的情绪如巨石般压在心头，使他始终沉浸于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

“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而让他最无法忍受的，还是25岁时被迫成婚！

对于那个始终陌生的女子，他在内心深处也怀有一丝无奈的同情。与自己相比，把命运维系在他人身上的她更为不幸。可同情毕竟不能代替感情，因此他只能消极地逃避。然而，尽管乾坤荡荡，他又逃到哪里去呢？这毫无感情的婚姻也许会永远像枷锁一样套在脖子上，使他终生无法摆脱！他曾经以笔为戟、振臂呐喊，试图唤醒国人去摧毁那万恶的旧制度，何曾想到自己也无法冲破这旧制度的压迫而不得不默默屈服。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当感到愧疚还是愤怒！

夜色深沉，渐感凉意，周树人立起身，缓缓踱回屋子。昏暗的灯光下，屋里颇显零乱。书架上堆放着一些古董文物，他下意识地拿起那只小小的明代石刺猬，自嘲地想：这些年，自己也许像它一样，身上、头上的刺都快磨平了吧？还有那尊汉代的陶制猫头鹰，本也是自己最喜欢的，看它那愤愤不平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的模样，倒不如把两只眼睛都闭上，再看不见那些世间的污浊，也算图个眼前干净。回首桌上，摆满了佛学典籍、古碑拓片、线装古籍……几年来，他就是靠抄录、研究这些东西来麻醉自己的灵魂，甚至在旧历除夕，他也是独坐于煤油灯下，抄录碑帖，对窗外的爆竹声置若罔闻，全然没有一丝过年的感觉。才三十多岁的周树人，觉得自己的心似乎已经死了。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内政局有一定变化。在诸多社会名人的极力推荐下，刚由国外归来不久的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上任之始，他便立即开展大刀阔斧的整顿与改革，首举之措，就是果断吸收进步学者，大力充实教员阵容。到校仅十天，便宣布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因此，由陈独秀担任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北京。接着，蔡元培又邀请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诸多思想激进的名人进入北大，并以“兼容并包”的原则聘用沈尹默、沈兼士、李四光、马寅初、辜鸿铭等有所长的学者。北大的校园，立时便成为人才济济、思想活跃、充溢着革新之风的理想之地。周树人前不久因母亲60寿辰而回绍兴探亲，刚回到北京便立即前去蔡元培住所拜访。有时两人不及见面，便通过书信交谈。周树人受蔡元培委托，亲自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图案；同时，还介绍自己的弟弟周作人到北大教书。1917年4月1日，周作人抵达北京，也住进了补树书屋。

补树书屋小院北面的两间屋子是长班及其儿子的住处，西房本有4间，最靠北的一间由于被前面长班的房子挡住阳光，很是阴暗，所以空置未用，其余3间归周树人居住。周作人来后，他将南侧光线稍好一些的房间让给弟弟居住，自己则住北屋，中间的一间权当会客室。两个人的房间布置得都很简单：书桌临窗，书架靠墙；作人的床沿墙横置，树人的床挨着书桌；作人屋里较为整齐，有茶几、长椅，树人的房间里则多了几只大板箱，专门用来搁置碑帖拓

片、古董文物等物品。

几年来，兄弟二人天各一方，如今在异乡相聚，自然兴奋异常。当夜翻书谈说，至凌晨方睡。接下来的几天，树人陪弟弟逛琉璃厂书肆，去广和居饮酒，赴青云阁品茗，至好友家夜访，甚是忙碌。

蔡元培的复出、弟弟的到来，使周树人的心情有所好转，但仍不能彻底改变他的情绪。那散发着淡淡霉味的泛黄古籍书页，那年代久远锈迹斑斑的铜鼎陶俑，那字迹模糊晦涩难辨的墓志碑帖，仍使他沉溺其中。似乎只有通过这些东西，才能排遣他那无法述说的苦闷，才能品味别人无法体会的情趣。他把精力集中于写什么《会稽禹庙窆石考》《口肱墓志考》《徐法智墓志考》《郑季宣残碑考》……

1917年7月1日，军阀张勋拥立溥仪复辟，终于使周树人愤然而起、断然去职。张勋的复辟之举遭到全国上下通力反对，7月3日，段祺瑞以拥护共和为名在马厂誓师起兵，讨伐张勋。7月7日，还出动了飞机轰炸皇宫，城内居民纷纷逃难。为避战祸，周树人与弟弟在朋友的帮助下离开绍兴会馆，暂时住到东城船板胡同的新华旅馆。12日，段祺瑞的军队攻进张宅，张勋逃往外国使馆避难，局势得以平静，周树人兄弟才重新回到会馆。而“复辟”与“反复辟”最终演变成一场闹剧，野心勃勃的段祺瑞趁机掌握政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讨伐段祺瑞，却连遭败绩……

如此动乱，使周树人更加迷惘失望，他对所谓的“革命”实在不能再抱任何幻想，对中国的前途愈加失去信心。他又重新躲进自己的小屋，深埋进故纸堆中，“使我沉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他希望这种自我麻醉能够有效，他认为自己已经再也不会再有青年时代的那种慷慨激昂了！

然而，他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有一些老朋友来了，他们不能容许周树人沉溺于这样一种状态中。他们怀着强烈的救国之心要求他应

当为国家、为大众做些事情。

在这些朋友当中，有一位是钱玄同。

钱玄同是浙江湖州人，早年在日本的时候就与周树人相识；后来到北京教书，1917年9月被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他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也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钱玄同与周树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同在北京，交往更是密切，几乎每周都要到绍兴会馆来聊天，时常聊到半夜。有时聊得兴起，还要到广和居小酌一番，至微醉方休。

对于周树人消极遁世的生活态度，钱玄同是很不赞成的。某日，他专程前来，与周树人进行了一次认真而严肃的长谈。这次谈话，对周树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数年后仍记忆犹新，因此他把这次谈话的过程记在了《呐喊》的“自序”里。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它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而且是从昏睡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钱玄同的话使周树人震惊了。是的，所谓

希望与绝望，是相对而言。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无法抹杀希望的存在。“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周树人终于对自己基于绝望而形成的苦闷与消沉产生了怀疑。

他想到了一些细微的小事。像那个经常拉车送他上班的黄包车夫，因误碾了路上的橡皮水管，竟招致巡警的殴打，自己只能略表愤慨而已；而一次将钱夹遗落车上，那淳朴的车夫当即送还，使自己又十分感动。这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善良大众，像牛马一样被奴役，像猪羊一般被榨食，像泥土似的被践踏，难道他们真的甘于在“熟睡”中死灭吗？难道那些“较为清醒的人”不应当努力去唤醒这些无奈地挣扎着的人们，而任其被铁屋子所闷死吗？

“较为清醒的人”，似乎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少；而“熟睡的人们”也未必真的“并不感到死的悲哀”。更何况“万难破毁”，并不等于绝无可能破毁。再坚固的铁屋子，只要有人醒来，怎能断言它必然没有破毁的希望呢？！

他感到自己的确有责任为打破这铁屋子做些什么。“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他拿起笔，开始写：“……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那篇小说发表于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1918年第四卷第五号。它像一声惊雷，震动了中国文坛。那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在小说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

作为后人，我们应当记住，真正的“鲁迅”，诞生于1918年那个特殊的年代，诞生于

“五四”运动的前夜，诞生于绍兴会馆补树书屋那普通的西房北屋中。

我曾经有过一个十分荒诞的念头：如果周树人当年宁可保持沉默，而再也没有外界的因素能够激发他，又将如何？

就他那种对于任何事情都要以一种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去对待的处世原则而言，周树人也许会成为现代中国一位有名的金石专家、碑帖专家、古文专家……，而且完全可能作为一代名士而声播海内外。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任何必要怀疑。

但是，那样一来，中国的文坛上，就永远不会出现“鲁迅”这个名字。

那将是多大的遗憾啊！

所幸，历史不存在“如果”。

犹如一只被茧壳束缚多年的蛾子，一旦破壳而出，它就会义无反顾地振翅奔向光明。哪怕面对的是一团能置其于死地的熊熊烈火，它也不会回头。

周树人终于下定决心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充满危险的道路。

他就是这样由周树人变成了“鲁迅”。

鲁迅有句名言：“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他再也不能沉默。

由此开始，鲁迅如爆发的火山，喷涌出无尽的炽热岩浆。小说、随感、新诗、评论……什么都写。他有太多的情感需要宣泄，他有太多的话要说。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想象，在补树书屋昏暗的煤油灯下，鲁迅是怀着何等的激情写出了那样多的文字。有时，《新青年》一期之中居然就有他一个人所写的七篇稿子。他笔下涌出的文字，如箭如戟，直接射向那罪恶的封建制度，直接射向那貌似坚固的“铁屋子”！

如《孔乙己》。

那迂腐落魄“满口之乎者也”的老夫子，活脱脱一个旧时代没落文人的缩影；那“……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那“多乎

哉，不多也。”堪称经典名句。在孔乙己的身上，难道不是隐隐地也显露出鲁迅内心深处隐藏着愤懑与悲哀？

还有《药》。

自绍兴会馆沿胡同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清朝刑场菜市口，这里的寸寸土地，都曾被鲜血所浸染。当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这里为变革中国而被砍下头颅。鲁迅每行至此，不能不想到，就在自己的故乡绍兴，也有一个旧时的刑场——轩亭口，当年秋瑾女士就是在那里惨遭杀害的。而那血腥的杀人场面，竟往往被愚昧的民众视为富有刺激性的闹剧！一个麻木至如此地步的民族，怎不让人绝望！要想中国出现光明，唯有首先打掉这可怕的麻木！

因此，鲁迅写下了《药》：一位为解放民众而被砍头的革命青年，颈上的鲜血竟被他所欲解放的人蘸了当作治病的药！

作为哲人与先知是痛苦的，因为他立于远高于常人的地方，能看到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却又常常不被他人理解和接受。而鲁迅于痛苦中已经开始体味到了一丝欣慰，因为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已经将那铁屋子侵蚀出些许裂缝，它必然会被苏醒了的人们所打破！

因此，在《药》中，鲁迅为被害的革命者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尽管他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个“梦”。

那牺牲的青年叫“夏瑜”，显然是暗寓秋瑾的名字。

就在《药》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当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梦”已经在开始变为现实……

1919年，绍兴的周氏家族经多年的风雨飘零，各房名下的土地已变卖殆尽，此时又要卖掉仅存的房产。这个时候，周氏兄弟已经积累了一些钱款：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月薪300元左右；周作人在北大任教，月薪200多元。因此兄弟二人决定将绍兴的老母及家眷接来北京，合家团聚，解除相互牵挂之苦。于是，他们开始

筹措资金，寻找合适的房屋，以谋求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找房子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而周作人在3月底即返绍兴，携妻子儿女去日本探亲，至5月中旬回京一趟，只待了一个来月，又于7月再去日本。8月10日，周作人把包括妻子、妻弟、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内的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接到了北京，暂时借宿在会馆隔壁的一个院子里，那是鲁迅在半个月前特地为他们租下的。对于鲁迅来说，安排全家人的新居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周作人忙着安顿自己的家小，寻房、买房的任务全得由鲁迅来完成。从2月至8月，鲁迅四处觅屋十数次，最后选中西城八道湾胡同一处院落，于8月19日晚在广和居与罗姓房主见面，交定金1750元，并付中间作保的人175元保金，由此正式买下了那处房屋。此后，鲁迅忙于四处筹钱，除了需要付清所欠的购房余款1350元，还要办理各种手续、修理改造房屋、安装上下水管道、购置家具等等，整整忙了三个月。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迁至八道湾新宅，就此离开了绍兴会馆。

自1912年5月6日至1919年11月21日，鲁迅在绍兴会馆居住了七年半时间。自17岁离家外出求学至55岁逝世，这里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绍兴会馆在宣武区南半截胡同7号，现在是居民甚多的普通大杂院。十几年来，我曾数次前去，希望寻找鲁迅当年的行迹。

第一次去，是在2000年。

会馆在胡同西侧，门板上尚留有斑斑漆痕，两侧的石礅经百年风雨侵蚀，花纹已残缺不全。正对大门的应当是影壁，但也不见踪影。临街一排破败不堪的房子似乎还是原先的老屋，而院内大部分房屋均已经翻建，根本无法看出以前的模样。“藤花馆”应当是在会馆的西北角，然而在杂乱无章的夹道里左拐右弯，却始终难以确定它的具体位置。

“补树书屋”本在会馆的南侧，也极难寻

找。横不成排、竖不成行的小屋，把院落分割得零七八落，简直如同迷宫一般。好不容易绕到了南端的墙根儿下，眼前出现的那个极小的院子使我根本不敢相信这里居然就是著名的“补树书屋”。正在踌躇之间，院中走出一个中年男子，上前询问，才知道这小院正是我要寻找的地方。巧的是这位名为李亚华的男子，如今就住在当初鲁迅的那间北屋里！

然而，眼下这院子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房前墙下搭起许多高低参差的小房，使院子变得十分狭小，以致面目全非。

西房住了几户人家。李亚华十分热情，邀我进他家里观看。令人感慨的是，这屋子十分窄小，仅十余平方米而已。由于窗外被当年长班那排住房挡住了一部分，因此屋内颇显阴暗。想当年《狂人日记》就是写成于这窗下的书桌上，而“鲁迅”的笔名，也就是诞生在这间普通到极点的屋子里！

与李亚华攀谈良久，他很为自己能住在鲁迅住过的地方而感到自豪。据他说，这些年曾有许多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带着对鲁迅的无限仰慕费尽周折找到这里，那种执著令人感动。

此后这些年，我每次路过，都会到附近一带胡同和这院子里转转。宣南一带，曾会馆林立。距绍兴会馆不远的北半截胡同，有浏阳会馆，即谭嗣同故居；东面米市胡同，有南海会馆，即康有为故居，其南侧的珠朝街有孙中山住过的中山会馆；西面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是毛泽东1919年组织“驱张运动”时来过的地方……然而，随时事变迁，街巷旧貌已多有不存。像那曾留下鲁迅无数足迹的广和居，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告倒闭。前些年由于修建菜市口南大街及扩建“两广大道”，拆除了相当多的胡同和房屋，原先的菜市口丁字路口成了十字路口，北半截胡同已经全部消失，南半截胡同北面出现了一条新的马路……如今走到这里，真是无法想象当年的模样了。所幸这绍兴会馆和补树书屋虽然日渐败落，居然奇迹般地



补树书屋鲁迅居室（2011年1月）

一直保留至今而未受触动。

遗憾的是，院中那棵大槐树早在1949年便毁于雷击。但在院子的西南角长有一棵颇大的枣树，至少也有几十年的树龄，枝叶茂密，也已经是“高不可攀”。据说这树上每年要结不少枣子，大约是未经嫁接的缘故，枣子的皮较厚、核较大，算不上好品种。但那枣子极甜极脆，有一种特别的味道。

李广桥前说故人

□ 孙玉民

“西瀛留旧宅，犹忆李公桥”，如今，60岁往下还知道什刹海有座李广桥的人，恐怕不多了。前些年有报发文，说李广桥的名字和西汉李广有关：李广征匈奴班师入右北平城，建桥作为纪念；又有一说是，李广桥乃李广在右北平射虎处。倒腾老北京的故古典儿，是好事儿，可这俩说法编的水平实在是缺乏常识。右北平是郡而非城，治所今已无考，就是找到了，也和后来的北平城搭不上界；李广射虎那年月，今天北京城这地界还是荒地。这故事唯一的“价值”，是把这座小桥的历史拉长了一千年，可惜，李广桥的历史远没有那么长。

明代北京仍以元初郭守敬从京北引的白浮泉等为京师水源，但水关挪到了德胜门，积水潭的水通过一条略呈L型的狭窄河道向南而西，在今天什刹海荷花市场附近汇入前海西边的一沼小泽，再入前海，最终汇入后海，与经过银锭桥下的河水形成回抱之势——其间的陆地就是金丝套。

这条小河叫月河或月牙河，也称清水河，是明清两代京师最具野韵的河道。明代笔记中说这一带“平湖远树”“清流急湍，映代左右”“岸无人行，古槐浓樾，覆荫如画”。可以想见，清水湍急的河两岸绿荫森森，景致清幽。再加上岸边民居的院墙土垣剥落，杂花野草丛生，衬着高槐垂柳，和水边泊着的小船、堤上晾着的鱼网，很难相信这古朴清峻的境界竟在京城之内。

明清两代，在京做官的南籍人士不少，对家乡的眷念在所难免，于是有水乡神韵的月河成了思乡抒怀的绝好去处。《京尘杂录》有这样的描述：“明湖滢漾，大似江南水国，每过其地，辄令人起秋风莼鲈之思。有龙庆堂，水槛，回廊，轩窗四敞，盛夏入其中，一望芰荷芦荻，间与鳧

鹭鸥鹭，上下浮沉，熏风滕凉，心清香妙，恍如置身海上三神山。”有“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之称的明代宰相李东阳更是对这块地方钟情了一辈子，称它是“京城第一佳山水”，并留下了不少吟咏这块美丽地方的诗句。

月河风光固然优美，可两岸居民的出行往来也受到影响，于是在月河上出现了好几座桥，以建筑材料而论，李广桥是其中档次最高的。

李广桥位于今天厉家菜所在的羊房胡同东口，这座简单的单孔石拱桥由李广捐建，但此李广不是汉代的飞将军，而是明弘治年间一位太监，他因善用符录法术和祈祷祭祀而受宠于孝宗，被授予传奉官，假借诏旨大行私弊，夺占京畿民田、垄断贩巨额利润，各地官员也纷纷送来大笔的贿赂。李广自然不会被放过风光优美的月河，何况有皇帝的信任和撑腰，他不但买地建起庞大的豪宅，还“引玉泉山水，前后绕之”，明清两代，私引玉河水都是当死的重罪，孝宗却对有关的弹劾视若不见。

弘治十一年，李广终于出了事，他劝孝宗修建万岁山毓秀亭，亭子落成之后幼公主夭折，不久清宁宫着了一场大火。占卜的结论是万岁山建亭犯了岁忌，气得太皇太后大怒：“今天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太皇太后要求严厉查办，吓得李广畏罪自杀。对李广仍如鸡肋的朱祐樞遣人去他家里查抄“异书”，结果找到了一本簿子，上有数名文武大臣馈送黄白米各千石百石的记录。孝宗不解：这李公公多大肚量能吃恁多的粮米！侍从说：黄米白米就是黄金白银。孝宗这回真动了气，虽然碍着面子还是赐给了祭品，但停拨了李广的祠俸。

李广权倾一时，但毕竟身体残缺，在六根俱

全的当朝文武面前权势再大也矮人一等，于是和明代众多太监一样捐建石桥佛寺以为功德，又请李东阳为桥题名，希望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李东阳幼年聪明过人，十八岁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一，以后历任要职，死后赠太师，谥文正。政治上虽没有大的建树——甚至被讥笑为伴食宰相，但清节不渝。相对于政治作为，李东阳在文学书法等方面的做为更大，他是茶陵诗派领袖，长于篆隶楷行草。这样的为人和性格自然耻与李广为伍，但又不愿意得罪他，便回以婉拒和拖延，直到李广饮鸩，桥名仍只在口头而没刻在桥上。中国有传统，官倒了必要灭他的痕迹，李广一出事，就有人提出将桥名改为“藜光”，只因字面矫情，叫起来又拗口，才不了了之。也有人顺水送人情，说李广桥其实叫李公桥——此李公即李东阳，可惜没人同意，毕竟李阁老没为建桥陶过一两银子。直到清代，法善式还在骂李广，说“奸瑄遗秽，桥亦蒙羞”。这是中国文人的毛病，怕被“遗秽”玷污了，别走就是，一座石头桥，有什么干净不干净！

历史上三海人文荟萃，李广桥一带更因为风光优美而成为文人雅士时常涉足的所在。诗家墨客经常在这里聚会，吟诗作赋，抚今追昔，留下了不少诗文。清代诗人张维屏等20多位文人在李广桥边的酒楼畅饮作赋为荷花庆生，一时传为佳话。

蒋廷锡是康熙雍正年间的名士，曾任礼部尚书、户部侍郎、文华殿大学士，参与过重辑《古今图书集成》，核定一万卷。雍正七年加封太子太傅，赐第李广桥南月河东侧，蒋宅大致位置在今天的西煤厂和大翔凤一带，有房屋一百多间，还有御笔条幅“秀写蓬莱”。蒋廷锡病逝后雍正停朝并遣朝臣前往祭奠，谥文素。蒋廷锡留有诸多诗书画作品，其中尤以花鸟画作著名，被清代张庚称为“以逸笔写生，或奇或正，或率或工，或赋色或晕墨，一幅中恒间出之”，从而开创了

根植于江南、轰动京城的蒋派。

法式善姓伍尧氏，原名开文，法式善（满语奋勉有才的意思）为乾隆赐名，蒙古族。28岁中进士，官至侍读，参与过《四库全书》编纂。乾隆五十三年移居杨柳湾并住了20多年，其宅位于月河西侧，“我家松树街，街东李公桥”，“余居距桥不数武”。法式善留下了大量诗书画作品和珍贵藏书，并主持京城诗坛近30年。著有《存素堂集》《梧门诗话》《陶庐杂录》《轻秘述闻》等，是研究明清典章制度、社会经济政治、图书目录、文献掌故、科举制度的重要资料。

我上学时，李广桥一带也曾住过几位名气不小的“文化人”。李广桥稍南月河东侧的大翔凤胡同西口，有座二层小楼，文革后期，放学路过这里常能听到与那个年代不搭调的优美琴声。小楼是中国音乐学院宿舍，里面住着一位曾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刘雪庵，他一生的作品中以抗战歌曲《离家》《上前线》（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并称《流亡三部曲》）、《长城谣》和《何日君再来》最为著名，但刘雪庵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又因《何日君再来》被当作汉奸歌曲而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一直过着凄惨的生活。

这一带当年还住着两位赫赫有名的女性作家。杨沫的家就在李广桥南，她的小说《青春之歌》曾是红极一时的红色经典作品，并被拍摄成故事片。杨沫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作品被批为“毒草”，经历相当不幸。不过，如果有机会读她儿子老鬼的作品《我的母亲杨沫》，和张中行的《流年碎影》，也会看到一个全方位的女作家。李广桥南路东大翔凤胡同东头，有丁玲的住所。丁玲是著名的左翼作家，曾经只身前往陕北。她的作品颇丰，其中尤以《沙菲女士日记》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最为人熟悉，曾获斯大林文学奖。解放后丁玲历经不幸，先是被定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

号称民国四大公子的张伯驹住的那不合规矩

的小院，位于李广桥东街后海南岸，这条街现在叫后海南沿。张伯驹称得上现代历史上的一位奇人，他对文物鉴赏、诗词、书画、戏曲颇有研究，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和唐李白的《上阳台帖》等珍贵文物并无偿捐献给国家，被称为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可惜的是，1957年张伯驹成了右派，直到晚年境遇也没有大的改变。张伯驹生活简朴，一度甚至靠夫人潘素画书签和彩蛋的收入度日，我小时候在街上看到过他，不经指点，谁也想不到他那奇特的经历。

月河东段北岸、过恭王府往东不远有片四合院，号称“海涯精舍”，资料称，这里“原为唐姓所设。内设佛教图书馆和佛堂”，此唐姓者，即为中国第一个只身前往海湾采访报道的新华社战地记者唐师曾的祖父唐宗郭。唐氏乃无锡望族，唐老先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届毕业生，做过北洋的官，潜心佛学，广做善事。1920年华北大水，老先生卖掉了自己的小楼，用得款为灾民买粮建房，感动得溥仪拿出数千大洋。唐老先生夫妇极和善，我去他家，老先生就是卧病在床也要笑咪咪地点头示意。“文革”中他老公母俩被批斗和殴打，房产被尽数强占，一家老小屈身在南官房胡同一间小厢房里，直到尼克松来华后老先生的晚辈从海外回来探亲，境况才有了些许改善。在他家，常见当年“海涯精舍”的照片，其势宏大，堪称那个年代的豪宅。

什刹海、李广桥一带云集了诸多官宦豪宅，清代住在李广桥附近名声最为显赫的两位王爷，一是恭亲王奕訢，一是庆亲王奕劻。

奕訢相貌伟岸，才略过人，本来有希望继承皇位，却败给了四哥。奕訢多有军功，曾协助两宫成功进行了清除顾命八大臣的祺祥政变，并主持大政和洋务，积极支持近代工业化运动，是满清贵族中较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但才能和智谋也使他备受防范，一生政治生涯几起几落，家庭生

活也多有不幸，是晚清一位悲剧式人物。

恭王府位于李广桥南、月河东岸，最初是清初权相和珅的宅子，而和珅宅据说就是在李广宅基上修建的。和珅，钮祜禄氏，原名善保。为人精明强干，深得乾隆信任，曾担任和兼任过清中央政府众多要职，封一等忠襄公和文华殿大学士，权倾一时。和珅“集骄奢贪于一身”，贪污受贿之巨惊人，《清朝野史大观》称，没收其家产达白银20亿两，而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过七千万两。故有人评价说，“康、雍、乾三朝之元气，殆尽斫丧于和珅一人之手”。和珅的宅邸后来被嘉庆赐给了成亲王，咸同年间改为恭王府。民国年间，恭王府被奕訢后人出售给外国教会。除了这座精美的府邸，奕訢还曾在李广桥东今小翔凤胡同购买过一处别邸，称鉴园。鉴园被出售后为万福麟所有。解放后叶剑英元帅一度住在这里，并在此与一些领导人秘密商定过逮捕“四人帮”的计划。以后鉴园成为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住宅。

庆亲王奕劻的府邸位于李广桥南的定阜街，这里原是一道光朝大学士琦善的住宅，以后成为庆王府。奕劻善于揣测和经营，因此官运亨通，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领班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办理过海军、练兵和财政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奕劻的才能和官德都不怎么样，且为人贪婪成性，曾与那桐和载振等一起卖官鬻爵，被称为那庆公司。由于获取了大量不义之财，没几年庆王府便以面积大、建筑精在京城诸府邸中后来居上。此外，奕劻（一说是载振）还曾经购买了李广桥北面的一片临水空地建起了怡园——当地人称金家花园，这里景色宜人，建有带齐全生活设施的建筑，载振定居天津后把怡园卖给了教会，后来成为方济堂医院，解放初改叫李广桥医院，不久取缔，改为领导人住宅，曾为杨成武居住。我小时候老人们还常提到这所医院，说服务态度极好，医院里还有洋嬷嬷。

月河西岸恭王府对面有涛贝勒府，府邸的主人是住在后海北岸的清末摄政王、醇亲王载沣的弟弟载涛，他在法国军校学习过骑兵作战科目，回国后历任要职并主持有关军务。民国时期为满族领袖，解放后被毛泽东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涛贝勒府后来出售给教会，在此兴办了著名的辅仁大学，并利用南面马圈和花园前空地建起了中西合璧的教学楼，辅仁大学北面的府邸则作为辅仁附中——解放后改为十三中，我曾在十三中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对那古香古色的校园和那些兢兢业业的老师，都有着深刻的印象。

解放后，李广桥一带有不少高级领导人住宅，并因居住过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而被誉为将帅街。这些将帅中，有官至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上将，有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后来曾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有叶剑英和徐向前两位开国元戎。

住在当年李广桥北的元帅徐向前晚年曾几次在家接待过来访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又亲自题写了“柳荫军民文明街”，柳荫街成为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著名单位，一时传为佳话。徐帅的警卫班成员、河北邢台籍战士袁满囤，1982年2月24日上岗时听到后海有人落水的报警，随即叫人替岗前往救人，他在水中拼搏了近40分钟，被大家拉上岸时已经昏迷，最终因呛水和冰冻不治，时年21岁。袁满囤牺牲后被北京卫戍区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追认一等功。至今，柳荫街的街心花园仍立着这位朴实憨厚的小伙子的塑像，上镌徐帅亲笔题写的“优秀的警卫战士袁满囤烈士”。

李广桥一带还出过一位“奇人”王倬。王倬1942年生于东北辽阳，毕业于东北大学经济系，因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和当兵的资历得以进入外贸部出口局工作。1960年3月，王倬用自刻的国务院专用章和模仿的周恩来总理的笔体，伪造出

了一份给央行总行的提款介绍信，并顺利取走现金。王倬能在极短的时间里习得周恩来笔迹，并滴水不漏地按流程拿走巨款，也算得上是个“人才”。案件很快告破，20万巨款还藏在李广桥南街三号院的蜂窝煤下面，连捆都没拆就被警察拉走。王倬不久被处决，但他的故事却传了下来，成了这一片老师和家长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

老北京说，直到上世纪30年代，李广桥下清澈的流水里还能看见小鱼和蝌蚪，后来逐渐淤塞成了臭沟。1952年，市卫生工程局以管道代替河道，上铺沥青马路，明沟成了李广桥南街。1965年北京更改地名，时任副市长、曾力主拆除城墙和牌楼的吴晗说，李广桥有封建色彩，不宜再做地名。十多年前栽种的柳树此时已经长成，于是改叫了柳荫街。40年前我在十三中上学时，这条街上除了上下课的时间几乎没人，而今却成了闹市，面对着如梭的三轮车和乌泱泱的人潮，真有隔世之感。游客恐怕没人知道，这条美丽的街道，原本是一条更美的河道，这，就是沧海桑田吧！

悼玉民兄

李茂福

佳文刊出，玉民远逝。曾为学友，朝昔多年。
惊闻噩耗，悲思不已。重读遗稿，音容宛在。天人永隔，撰辞祭之。

長天垂泪傾盆，大地鮮花送君。
莫道英年早逝，學人風范永存。

西单剧场与北京曲剧

□ 李明德

在今天长安街上，西单路口往西路北就是原来的西单剧场，这剧场早年叫哈尔飞戏园，解放后定名为西单剧场，是北京市曲剧团的专用剧场。几十年来观众们在这里欣赏了众多的曲剧大戏。

在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的日子里，该团在长安大剧院举办了北京优秀剧目演出季。老北京的观众，热爱国粹京剧，但对于独具地域特色的北京曲剧更有感情。该剧种有浓郁北京韵味——唱腔委婉、吐字清晰、表演朴实；又有深受欢迎的代表剧目。北京曲剧团和北京曲剧是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和艺术品种中的单一剧团和单一剧种。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排演过近二百余个剧目，其中《杨乃武与小白菜》《箭杆河边》《珍妃泪》等，均被拍摄成戏曲艺术影片。《烟壶》还拍摄成戏曲电视剧。该团取得的辉煌成果，在广大观众心目中扎下了根。

曲剧的形成和定名

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的曲艺名家在前门箭楼上成立了大众游艺社。当时每天都有鼓曲演出，深受观众欢迎。演员又根据自己所会曲种的演唱特色，结合他（她）们自身唱做表演的条件，创排了曲艺剧。当时曲艺名家魏喜奎、关学曾、颜荣甫、尹福来等自编自导，借鉴了拆唱八角鼓的传统形式彩唱化妆，演出了曲艺剧《探亲家》，剧中有情节故事和大段的单弦牌子曲唱段，以及奉调大鼓、梅花大鼓、琴书的旋律，演唱京腔京韵，地地道道的京白，深得曲艺爱好者的欢迎和好评。恰恰此时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在中国文联和北京文联任职，他自幼生在北京，是满族人。他喜爱京城的一草一木，尤其对曲艺的岔曲和八角鼓等民俗艺术甚为喜爱。他与不少位曲艺演员都是好朋友。箭楼上曲艺剧《探亲家》的

演出，他早早就来到了剧场，认真观看全剧。他对这一新的演出形式，唱腔的委婉动听、旋律的优美、京音的吐字深有感受，为曲艺名家的创新而祝贺。在座谈会上，老舍先生激动地对参加演出的演职员说：“你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填补了北京历史上没有地方戏的空白。”他建议将“曲艺剧”中的“艺”字去掉，就叫“曲剧”。为了突出地域特色，建议在“曲剧”的前面加上“北京”二字，“北京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不久老舍先生为该剧团撰写了新戏《柳树井》，是描写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戏中女主人公由魏喜奎扮演，全剧在唱腔、化妆、音乐、舞美上都下了大力，演出获得了成功。这是北京曲剧第一出打炮戏，也使得这一剧种站住了脚。

周总理来看《杨乃武与小白菜》

在该团的保留剧目中，深受观众欢迎、巡演全国的好戏，要首推清装大戏《杨乃武与小白菜》，以及《啼笑因缘》《雷锋》等多出。记得《杨乃武与小白菜》取自清代四大奇案，其剧情曲折，扮演杨乃武的李宝岩、扮演小白菜的魏喜奎均是曲艺名家，全剧演出达三个小时，演唱声情并茂，甚是感人。该剧最初上演是在位于前门外大栅栏的前门小剧场，剧场可坐三百余位。一天，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忙完公务后，晚七点多坐车来到前门大街，将车停在大栅栏街口，自己步行到剧场来看演出。全剧演过前几场，后台的演员才得知周总理来看戏了。全体演员都兴奋起来。剧终后，总理来到后台，接见全体演员，进行了座谈，总理说：“我访问非洲十国刚刚回到北京，看到报上的广告，就马上来看戏了。”总理对这出新戏的演出成功深表祝贺，还提出了修改意见。后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演出数百场，并于60年代初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成舞台艺术

片。放映全国，使北京曲剧在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对北京曲剧这一艺术形式有了深刻的印象。

改革开放出新戏 《珍妃泪》巡演全国

80年代，文艺的春天来到了。北京市曲剧团在积极排编新编历史剧《珍妃泪》的同时，也注重发现人才，培育曲剧接班人。这时曲剧名家魏喜奎已步入老年，她在自己的学生中观察了很久，她将能唱奉调大鼓，又善表演的女青年甄莹、许娣收为弟子，并参与曲剧的排练和演出，该团同时培养的优秀男演员耿守春、张绍荣、孙宁等，也都成了台柱了。这出清宫历史戏《珍妃泪》剧本写得好，演员多以新秀登场，老演员做指导，发扬该团善演清装大戏的长处，加上大家齐心协力，在唱腔、音乐、舞美诸方面的严格要求下，首场《珍妃泪》在西单剧场上演，这是80年代初北京舞台上的大戏，观众争相购票，场场爆满。新老观众欢聚一堂，尤其对曲剧舞台上甄莹扮演的珍妃，耿守春扮演的光绪皇帝甚是喜爱，他们的精彩演出得到观众热烈掌声。不少观众看过该戏，又带着朋友重看，一时让北京舞台亮了一把。各地演出公司邀请《珍妃泪》剧组巡演全国达三个月之久。有时全剧落幕，观众来到后台，要求见珍妃、光绪签名留念。两位青年主演通过百余场的演出实践，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回京后又被新闻电影制片厂将此剧拍摄成实景的舞台艺术片，随后剧团又改编排演了老舍先生几部名著以及新编历史剧《少年天子》等。

全团“一棵菜” 演好新剧目

北京曲剧团改编、排演老舍先生的名著《龙须沟》《茶馆》《正红旗下》以及京味作家邓友梅的大作《烟壶》时，每排演一出戏都体现出全团“一棵菜”的精神。在排戏和演出时大家能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平时有的演员也接影视剧的活儿，有的还担任重要角色。但团里的新戏一定下来，大家会立刻推掉外边的排戏活动，立即投入到本团的任务中，全团上下一条心实在让人感动。在排演大戏《茶馆》时，团里请

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顾威先生，曲剧《茶馆》要保留原话剧的精神，又要突出曲剧唱、做的京韵京味，演员在演唱、表演上下了大力，全剧在音乐、舞美、灯光上都有了新的创意。《茶馆》的上演一炮打响。他们将主要演出场地设在了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当时正是暑假，又因中学课文里有《茶馆》的片断，这时又有学校来联系包场的事，加之团领导也鼓励全团同志多动脑筋，力争为北京的中小學生多多演出，票价对师生优惠，受到青少年观众的欢迎和喜爱。有时一天演出三场，演员们不怕苦和累，创造了假期演出百场的纪录。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全团演职员“一棵菜”的团结精神是分不开的。《茶馆》《龙须沟》《烟壶》等剧于1997年和2000年两度赴台湾演出。

曲剧新人在成长

北京市曲剧团在几十年的演出实践中，团领导一直把培养新人放在首位，力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魏喜奎、李宝岩、孙砚琴、佟大方等老一代艺术家是曲剧的创始人。80年代甄莹、许娣、张绍荣、孙宁、佟仲琪等中年一代正是北京曲剧新时期的代表。近年，该团与中国戏曲学院招收了曲剧大学本科生班，由专业教师授课。这批学生的到来，又使曲剧有了第四、五代新人。这些本科生自身条件很好，学唱曲剧的成套唱腔很是认真，有的原来是学民歌的，她们下功夫向京腔京韵学习，在老演员的帮助下进步很快，在这次优秀剧目演出季中，卢雪文、王玉、杨承霖、李相岩、董汶亮等这些年轻人都在《北京人》《少年天子》《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龙须沟》《正红旗下》等大戏中担任主要角色。北京曲剧的代代新人，正展示出他（她）们的艺术青春的活力和光彩。

北京曲剧能有今天的成果，是与西单剧场的排练演出和观众的人气分不开的。如今这一剧场已经不存在了，但历史上西单剧场对北京曲剧的功绩和观众的影响是永远存在的。

白塔寺周边的四条大街

□ 周园

“街”作为城市中的地名用语始于汉代，《汉书》已有对大街名字的记载。《后汉书·张楷传》中有“车马填街”之语。《墨子·号令》：“为守备程，而署之曰某程，置署街衢階若门。”其中“置署街”指街道和交通要道。《墨子·备城门》又云：“疾击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街巷，皆无得行，行者斩。”其中“里中街巷”指城中街坊和里巷。

白塔寺周边的大街既有近八百年历史的老街，又有解放后重新铺设并命名的新路。由2008年《北京部分城区胡同位置图》可见，白塔寺属宫门口地区，东侧为赵登禹路；南面为阜成门内大街；西侧为阜成门北大街，即今西二环路；北面为平安里西大街。四条大街纵横交错，环抱于白塔四周，它们的形成与变迁更是一部古都北京的文化史。

明清时，城门一般是与“街”联系在一起。民国后，“里”开始加入街巷胡同的称谓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开辟的道路则多冠以“路”之名。碰巧的是，白塔寺周围几条大街的名称正好印证了上述说法。

古老的阜成门内大街

阜成门内大街西起阜成门立交桥，东至西四十字路口，因位于阜成门内而得名，是北京最古老的大街之一。阜成门元代称平则门，为元大都内城九门之一，街名取自城门，称平则门街。

“平则”意为公平的法则，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均守平则，以安邦国”。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改平则门为阜成门，城内大街亦改称阜成门街。“阜”由土山引申为盛，“阜成”出自《尚书·周官》：“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清乾隆时期，将阜成门街分成两段，从阜成门至沟沿(今赵登禹路)仍称阜成门街，从沟沿往东至西四牌楼，称为羊市大

街。民国年间，羊市已不存。1965年，阜成门大街和羊市大街合称阜成门内大街。

阜成门内白塔寺西原有朝天宫，始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位于阜成门街北，锦什坊街对面，系宣宗章皇帝效仿南京朝天宫式样建成。自白塔寺西垣，至今宫门口西岔，皆为宫门旧址。据《日下旧闻考》载：“朝天宫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师府也。”宫内有三清殿、通明殿，建普济、景治、总制、宝藏、佑圣、靖应、崇真、文昌、元应九殿，东西建具服殿以备临幸，为明代北京最大的道教宫观。宪宗纯皇帝于成化十七年(1481)重修，天启六年(1626)六月二十日夜，因大火十三殿齐遭焚毁。现旧址遗迹虽无，但宫门口之名留存至今。

阜成门内大街历史悠久，颇具北京风韵。街两侧保留着自元、明、清以来及近现代建成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东段有广济寺，始建于金，重修于明，现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中段有历代帝王庙，建于明代，现为文物保护单位。西段有妙应寺白塔，建于元代。三座古刹均位于街北且一字排开。《顺天府志》曰：“阜成门俗沿元称曰平则门，迤东为马市街，历代帝王庙在北，故保安寺址也。东西有坊，曰景德，亦称景德街。宏慈广济寺在庙东，临大市街，旧为西刘村寺。白塔寺在庙西，元为圣寿万安寺，名为妙应寺。”

阜成门内大街的百年老字号店铺更是历史久远。坐落于阜成门内大街165号的白塔寺药店始建于同治十二年(1873)，有130多年的历史。前身为琪卉堂和大和堂，由来于明代万历年间开设的千芝堂。光绪七年(1881)，宫廷太医吴霭廷将千芝堂买下，聘请王子丰任掌柜。精明强干的王子丰在1900年庚子之变时，低价收购贵重药材，战后物价回稳，为千芝堂赢了利。功高震主，王

子丰逐渐与吴霭廷产生芥蒂而负气辞职，从此结冤。1917年，继任千芝堂掌柜的吴受臣在阜成门大街白塔寺开办琪卉堂药铺，王子丰随即在琪卉堂边上开设了大和堂药店，两家展开商战。1942年，资本家谢康夫将两家药店买下，合二为一。1953年，药店被收归国有。1980年，更名为白塔寺药店。

福聚来茶庄创建于1937年。创始人张燕彬自幼在茶铺学徒，30岁时，他在北京通县开设福来永茶庄，因薄利多销，生意红火。不久，被附近新开的天庆茶庄抢走了生意，经打听方知此茶庄为分店，本号在京城白塔寺东侧路北。于是张燕彬集资在白塔寺天庆茶庄靠西又开设茶庄，为图吉利起名“福聚来”，并请书法家潘玉峰题匾，高悬的金匾黑字闪闪发光，吸引不少来客。福聚来茶庄经营的小叶茉莉花茶，加工精细，深受北京人喜爱。从此，福聚来茶庄买卖兴隆，包揽京西一带的茶叶，有“西霸天”之称。“文革”后，福聚来的金匾被改成金字黑底。解放后，白塔寺的福聚来并入元长厚茶庄，现位于阜成门内大街159号。

现在，新建的鲁迅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也成了阜成门内大街的文化风景。20世纪90年代，阜成门内大街至景山前街沿线合称阜景一条街，此街被鲁迅称为“最具有北京风味的一条街”，被老舍誉为“北京最美的街道，有山有水有河有楼”。现已成为西城区文化旅游一条街。

数次更名的赵登禹路

赵登禹路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而得名。赵登禹路元代曾是大都金水河的古道。由和义门(现西直门)引护城河水东流，经河槽流入太液池。明代因金水河上游断流，河道逐渐演变成排水沟，俗称河槽，明代称大明濠，清代称西河沿。明清两代，在今赵登禹路南口有一座石桥，称马市桥，石桥迤东有马市、骆驼市、羊市，牲畜贸易曾兴旺一时。《燕都丛考》曰：“阜成门大街之中间驾于大明濠上者曰马市桥，今已平。”马市桥即

位于今天的阜成门内大街与赵登禹路的交汇处。

作为纵贯京城内城西部的排水干渠，大明濠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清朝后期，北洋政府在河道上修马路，此段称北沟沿。1921年至1930年开始明沟改暗沟工程，沿暗沟之上建成的马路统称为沟沿大街，后演变为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和佟麟阁路。1946年抗战胜利后，为纪念29军为抗日捐躯的爱国将领赵登禹，国民政府将原北沟沿大街改称赵登禹路。“文化大革命”中易名中华路，1971年更名白塔寺东街，1984年改回赵登禹路之名至今。

交通要道平安里西大街

平安里西大街，顾名思义，因位于平安里之西而得名。说起平安里，此名在元、明、清的版图上是不存在的。明时为太平仓，清时建庄王府，南至太平仓，北至麻状元胡同，为清“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承泽亲王硕塞的府邸。硕塞为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子，于顺治元年被封为多罗承泽郡王。顺治八年以功晋封为和硕承泽亲王。硕塞长子博果铎于顺治十二年(1655)袭亲王爵位，改号庄，此后均以庄亲王承袭。第十一代庄亲王载勋于光绪元年(1875)承袭爵位，力主利用义和团抗击西方列强，在王府内设坛，庚子之变(1900)八国联军入侵，王府被焚毁。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李纯、李馨兄弟从最后一位庄王溥绪手中买下庄王府，拆除王府建筑运回天津，在此兴建中西合璧式住宅，将地名改为平安里。由门额砖匾上书“平安里”，落款“癸亥夏 桂山书”得知平安里建于1923年夏，匾为李馨(字桂山)所书，现匾额保存于西城区文化委员会。

《燕都丛考》曰：“太平仓，原有庄王府，其东为李纯家祠，其旁建筑曰太平里。”解放初期，为了拓展皇城地安门北城根至西直门的马路，打通城市干道，方便通行有轨电车，平安里的东西院墙被拆除，拦腰修筑成一条马路，称平安里大街。从1949年《北平旧城街巷胡同图》可见，平安里大街与皇城根相连，无平安里西大街。1965年，平安里大街与西皇城根合并统称地安门西大街。

平安里西大街建于20世纪70年代，西起官园桥，东与地安门西大街接壤，中与赵登禹路交叉。1971年，拆除今官园桥迤西的月树胡同、官园胡同北端、观景胡同、育强胡同及鱼雁胡同南端后辟建而成，称平安里西大街。1998年，开始“平安大街”改造工程，拆除后车胡同、北兴胡同南端，并入育教胡同，将平安里西大街拓宽并向东延伸，使其与地安门西大街相通，连贯东西。

育教胡同(1965年以前称翊教寺胡同)，原有翊教寺，其街因寺得名，今寺已不存。经《日下旧闻考》《顺天府志》考证，翊教寺为古刹，位于西护城河槽西。据明侍郎汪道昆和编修林增志二碑称，寺始建于宋朝。明成化八年(1472)重修，久废矣。嘉靖三十一年(1552)，司礼太监焦忠亦重新修建。万历五年(1577)，僧人心宗募资修寺。清时，翊教寺为戒坛下院。1926年，此处曾建“北平翊教女子中学”。

平安里西大街，北侧原为西官园质亲王府和东官园端郡王府。《啸亭续录》载：“果亲王府在草场胡同，今为端亲王府。”“诚亲王府在官园，今为质亲王府。”庚子之变中，两座王府遭焚毁。民国后，原址改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校，后改为北大工学院。现在，东部为中央纪委机关，中西部为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该中心东北角建有“八国联军火烧端郡王府遗址”纪念碑一座。

平安里西大街南侧东段有富国街(明称大桥胡同)，清为祖大寿旧宅，名祖家街；西四北八条(明称武安侯胡同)，因武安侯郑亨府邸在此，后演称武王侯胡同。西段有新建的梅兰芳大剧院、国家京剧院等大型现代建筑。位于平安里西大街32号的梅兰芳大剧院，落成于2007年。其外部结构具现代设计理念，钢架支撑的扇形屋架配以玻璃屋面，构成动态结构，形成流畅、生动的建筑形体。内部装饰融入中国元素，红色立柱镶嵌金色木雕，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剧院以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命名，大厅塑有梅兰芳铜像。剧场以演出戏曲为主，弘扬国粹。同侧相距

不远的中国京剧院位于平安里西大街路南22号，现名国家京剧院，成立于1955年。多年来，京剧院创编、上演近600部优秀剧目，形成了传统的艺术特色和创新的艺术风格。

现在，平安里西大街与地安门西大街、地安门东大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连通组成了平安大街，成为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街两侧保留了部分老式建筑，营造出朴素淡雅的古都风貌。

曾为城墙的阜成门北大街

阜成门北大街南起阜成门内大街，北至平安里西大街，为城区西二环路的组成部分。1949年以前，阜成门至西直门为内城西城墙和护城河，沿墙根为北顺城街、西城根、南顺城街。1965年开始修建地铁。内城城墙、阜成门、西直门先后被拆除。西直门至阜成门的城楼及沿线的城墙被拆除，改护城河为盖板河而辟建为道路。1971年，此路段因位于阜成门之北，故定名阜成门北大街。1981年，分为南段阜成门北大街和北段西直门南大街，中以平安里西大街为分界点。现在，西二环路官园桥至阜成门桥为阜成门北大街。

阜成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墙的南侧门，明洪武十四年(1381)重修，明正统元年(1436)重建，正统四年(1439)竣工，是通往京西门头沟的门户。明、清所需煤炭，皆由阜成门进京，故又称“煤门”。1965年，阜成门城楼被拆除。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城垣之中门，明永乐十七年(1419)修缮后，将和义门改为西直门。明清时，经此门为皇宫运送玉泉山泉水，故有“水门”之称。1969年，西直门城楼、瓮城、箭楼等一并被拆除。1975年，阜成门建立交桥，昔日护城河的河床上，修建起环绕北京老城的二环路，成为今日北京的交通干道。

天桥走出的评剧明星

□ 周系皋

上世纪50年代初，新风霞主演的评剧《刘巧儿》，可说是家喻户晓。拍成电影后更是风靡全国。那时候家家户户的收音机里和大街小巷的高音喇叭里，成天价播送《刘巧儿》。

“巧儿我自幼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怎能嫁他？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退，这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当模范，人人把他夸。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就放不下，因此我偷偷地爱上了他……”“但愿这个年轻人他也把我爱，过了门儿，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他，做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这些著名唱段，那会儿几乎大人小孩儿都会唱。新风霞这个名字也就印进了亿万观众、听众的心中。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到现在这些唱段我还会哼。著名画家黄永玉后来写文章说：“我是先认识她（指新风霞）之后才认识‘评剧’的，看了她的《刘巧儿》才明白评剧有那么灿烂的世界”。

没有想到的是，30多年后，我竟有机会拜访新风霞，与她结识，与她交往，并成为了朋友。她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极为可亲，没有丝毫的明星架子，后来她竟与我姐弟相称。时间长了，彼此也就不隔心，有些掏心窝子的话，她也肯对我说。

在与她的交谈中，她曾多次向我谈到她的人生遭际，因而，我对她的身世，也就有了一些了解。

新风霞是在天津南市贫民窟里长大的。七八岁就跟堂姐杨金香学戏，唱戏，很早就唱红。但她红遍全国，成为一代评剧明星，则是从北京天桥开始的。轰动一时的《刘巧儿》，就首演于天桥的万盛轩戏园。

1949年，新风霞由天津来到北京，住在天桥南头的一条小胡同里，在万盛轩戏园子唱戏。万盛轩建于1931年，历来专唱评戏。园子内是土台子，长板凳，没有楼座，从台上能看到大门。每天早晨8点

钟开戏，一直到晚上9点散场，几出戏来回倒着演。看戏的不买票，进门往一个大斗里扔一毛钱，可以看一整天。

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风霞在万盛轩演出极为红火，除《刘巧儿》外，《花为媒》



新风霞剧照

《孽海深仇》等

皆在此首演。她以唱腔优美、流畅婉转而著称。她在水天桥演出期间，万盛轩常常是门庭若市，热闹红火异常，开创了万盛轩有史以来的最佳时期。以至新风霞成了客店招揽买卖的招牌。天桥的小客店很多，争着招揽客源。有一家小客店竟挂着新风霞的大照片，打着锣吆喝：“来看呐！这是评剧明星新风霞——”

新风霞唱戏在万盛轩，

一毛钱就能看一天。

您来住我们兴盛店，

大通铺舒坦保平安。

兴盛店离万盛轩真不远，

看戏来回还能省车钱。

来呀！快住兴盛店吧！”

那时有许多文化界名人都到天桥看新风霞的戏。著名作家老舍爱凑热闹，听到店家吆喝，他在看戏前还真就进店，给了铺头钱，在大通铺上躺了一会儿。之后在后台见到新风霞，兴奋地说：“我今天可开了眼，大通铺，一排能躺十来个人，晚上一定很热闹，我真想晚上住一宿。”

老舍先生经常到天桥看新风霞的戏。陪同他的是北京市文艺处处长张梦庚。有时他还拉大作家赵



万胜轩——万胜剧场

树理、吴祖光一起去，画家黄苗子、郁风夫妇也是常客。就是在众文艺界朋友的撮合下，新风霞与天才作家吴祖光结婚的。

1950年8月1日，吴祖光、新风霞盛大的结婚仪式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几百人出席。赫赫有名的文化界老前辈阳翰笙为证婚人，男方的主婚人是剧坛宗师欧阳予倩，女方主持人是文坛巨匠老舍。

老舍先生对新风霞的影响真是太大了，什么时候提起，她都感动不已。那时候新风霞不识字。她的全家老小也没个识字的人。每年家里只买一本书，就是皇历，但查日子、测吉凶还得求人。一次谈话中老舍先生得知她不识字，就非常严肃地说：“这可是不行啊！要读书认字！”又说：“要学习呀！先从一、二、三、四简单的学起，要随时想着学，抓紧学，有了文化才能提高演唱艺术。以后不能演戏了，拿起笔来能写，当作家，当先生。”新风霞当时听了还觉得很好笑，心想：“就凭我，当作家？”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老舍先生的这句话竟成了真。“文革”中，她遭到残酷迫害，身体致残，被迫走下舞台。但她没有倒下，没有消沉。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醒”。她虽不能

登台演戏了，但脑子还能活动，嘴还能说。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青年一代演员的同时，她拿起笔来，发奋写作。写作，对常“爬格子”的人都是一件苦差事，对于她这个从小学戏，没读过书的人来说，那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她有生活，有激情，有许多话要倾吐。她先跟人讲，讲明白了就写。有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字典翻烂了，用布粘好。在她书房的写字台上，我看到了那本字典。个中辛与酸，谁解其中味？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靠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毅力，她写出并出版了《新风霞回忆录》《艺术生涯》《我当小演员的时候》《新风霞评剧谱》《新风霞说戏》，还有记录在“文革”中与溥仪一同劳动改造的《我和皇帝溥仪》等十余本书。有的还被译成英文、吾尔都文。她赠我的几本签名书，现在我都非常珍爱地收藏着。

1980年，叶圣陶看了她出版的第一部书《新风霞回忆录》说，“风霞应该参加作协了。”于是，1981年，由叶老和严文井介绍，新风霞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她是民间艺人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第一人。

新风霞从小就会绘戏衣，画花样。解放初期曾拜齐白石为师学过画。以前演出繁忙，没画出成绩。身体致残后，有时间练画了，绘画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请她为我画一张，她欣然应允，为我画了一张秋菊，吴祖光先生题的字。因我早已与吴先生熟识，他还另写一条幅送我。现在，他们二位的字与画均装裱镶框挂在我家的客厅里。

新风霞大姐已经走了多年。每当我看到她送我的书籍和画作，她的音容笑貌就会立即浮现在眼前。我怀念大姐。

新风霞是天桥走出的明星。宣武人不会忘记新风霞在天桥取得的辉煌。人们走过天桥，新风霞那优美的唱腔仿佛又在空中回荡。宣武人将永远怀念新风霞。

梨园怪杰金少山

□ 马铁汉

金少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京剧花脸演员。他身高体壮，扮相魁梧。声若铜钟，悦耳动听。基本功扎实，身段边式，广采众长，能戏甚多，是一位文武昆乱不挡的全才演员。20世纪40年代有“十全大净”之美誉，世称“金派”。

金少山名义，又名仲义。1889年9月（阴历八月二十）生于北京。满族，祖父金龙吉，在清朝时，经营玉器业。父金秀山原为勤行厨师，因喜爱高腔、皮黄，曾为市内皮影戏伴唱，梨园界称作“钻筒子”。金秀山嗓音洪亮，颇受观众欢迎。不久，被京剧花脸名伶何桂山（人称何九）发现，十分欢悦。遂委托小生名宿德珺如和金秀山商谈，愿否学演京剧？金秀山闻知何九爷垂青，满心欢喜，立即来到何家，说明自己有志于此。于是择一吉期在前门外取灯胡同同兴堂，行拜师礼。从此，金秀山与何桂山形影不离，练功学艺十分刻苦。每日拂晓前起床，打着纸灯笼去天坛喊嗓子。从此，边学、边搭班。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演出了《黄金台》《龙凤阁》《忠孝全》《法门寺》《飞虎山》《白良关》《御果园》等。后来，与谭鑫培、杨月楼、许荫棠、德珺如等名家合作，声誉鹊起。经京剧泰斗程长庚推荐，选入皇宫演戏，名曰“内廷供奉”。金秀山每周一、三、五到颐和园内德和园大戏台演出，深受皇家宠幸。

将门虎子 梨园“神童”

金秀山曾有三子，长子四岁夭亡，次子松林继承祖业，经营玉器。三子仲义（即少山），自幼受父亲熏陶，喜爱京剧、高腔和梆子，有时候模仿父亲唱几句花脸戏，韵味十足。金秀山爱如掌上明珠，人称“神童”。仲义六岁开始，从韩

乐卿练功，从踢腿、下腰到毯子功、把子功等，循序渐进。韩老师要求严格，仲义学得用心，因而在基本功和武功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八岁时，拜德珺如为师，学了《雅观楼》《罗成叫关》等小生戏，但仲义还是偏爱花脸戏，遂向师爷何桂山学《嫁妹》《火判》《山门》《十面》等戏。其聪颖好学且一学就会，因而深受何老喜爱，他指着仲义对别人说：“此子将来非同小可！”

仲义连学带练达数年之久，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在此期间，不时地在一些堂会上进行艺术实践。16岁时，改名少山，随父正式搭班扮演一些次要角色。后来父子同台演出《白良关》《洪洋洞》《穆柯寨》等，深受观众欢迎。在《白良关》中，金秀山饰尉迟恭，少山饰尉迟宝林，亲父子扮演戏中的亲父子，情趣盎然。尤其是《穆柯寨》，金秀山饰孟良，少山饰焦赞，在“烧山”一场中，孟良说：“贤弟，你可别蒙我呀！”焦赞接着说：“二哥，我要是蒙您；我是您儿子！”每逢演到此处，观众准会哄堂大笑。

少山除了继承师爷和父亲的拿手戏之外，还不断吸收朗德山、刘寿峰、刘永春、刘鸿声的铜锤花脸戏以及李连仲、黄润甫的架子花脸戏，丰富和充实了自己的演唱和表演艺术。

少山性格开朗，爱好广泛，除演戏之外，还喜欢摔跤。他买了几身褡裢、几双刀螂肚靴子和骆驼绒绳子，装了几麻袋沙土，召集了不少同龄朋友，还从上海请来前清扑户营的亚永禄担当教练。大家每天练踢桩子，背口袋，学各种绊子，然后便撂起跤来。金少山身高力大，腰脚灵活，摔得一手好跤。

初演霸王 一鸣惊人

20世纪30年代初，金少山已进入不惑之年，在艺术上已日臻成熟。这时他长驻上海天蟾舞台当班底（基本演员）。不久，大名鼎鼎的梅兰芳来沪演出，其《霸王别姬》一剧已遐迩闻名。此次杨小楼没有同来，经“海上闻人”张啸林推荐由金少山扮演楚霸王项羽。责成戏班管事的李春林给金说戏，李春林按照杨小楼的路数说了两遍，金少山对人物的性格领会、琢磨，又按自己的条件进行发挥，塑造了楚霸王的艺术形象。

金少山扮演的项羽头戴夫子盔，身穿鹅黄绣金蟒。脸谱勾通天鼻、寿字眉、蝌蚪眼窝，黑白分明，有股威风煞气。他出场后唱[粉蝶儿]：“俺英勇盖世无敌，灭嬴秦，立楚地，征战华夷！”省略头句，唱得满宫满调，音量压过了伴奏的一对唢呐，博得了满堂彩。

在“大战”一场中，金少山头戴“八面威”上插一支黑色大花翎，身穿黑色平金靠，一杆黑色绣金帅字旗紧随其后，身旁的马童身着黑衣、黑裤、黑坎肩。舞台画面浑然一体，与头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韩信设下“十面埋伏”之后，霸王在[九锤半]锣鼓中上场，金少山吸收了《铁笼山》中“姜维观星”的表演方法，他运用推髻、趋步、横枪亮相，四处瞭望，观察敌阵。他行至台口时，众汉将从两厢包抄而上，边高声断喝：“项羽归降！”这时的项羽左手持枪、右手执鞭，边打边唱，功架稳健。一招一式都融于锣鼓的节奏中。虽身陷重围，却从容不迫。通过这场载歌载舞的开打，表现出项羽器宇轩昂、身经百战的英雄气概。

梅兰芳扮演的虞姬，堪称精美绝伦。此次演出在人物扮相和剑舞诸方面又有新的加工和改进。头上的如意冠梳得较高，鬓旁由金镶鬓花代替了缎花。软缎绣花黄帔增加了装饰，舞剑时

的小腰裙上由鱼鳞甲代替了亮片制成的飘带。[二六]一曲中的身段和亮相较前期更注重造型美。“剑套子”原来是奏完[夜深沉]曲牌后，下腰作为结束。如今在曲牌后又加了胡琴花挂儿，在紧凑的节拍中，梅兰芳加进了“鹞子翻身”和“四刺”的身段，犹如天鹅戏水，珠滚玉盘，最后才以下腰作为结束，使这一段剑舞更能反映出人物的心态和柔情。

这出《霸王别姬》真是珠联璧合，美不胜收。连演15场，场场座无虚席，剧场之热烈实为罕见。

在观众席中，有位英国巨商，名叫哈林，他连看了几次，赞不绝口。他邀请梅、金率团赴香港演出，双方定下合同，择日启程。

动身那天，剧团全体人员都登上了皇后号轮船，就差金少山未到。开船时间将近，英轮大副提出警告说：“如果延误了起锚时间，要按小时赔偿！”哈林一边应付大副，一边派人打电话催问。一小时后，金少山才姗姗而来，怀抱着他心爱的小巴儿狗——“小黑炭”，英国船员上前拦阻，不准携带动物上船。金少山却说：“不让它上船，我也不去了！”说罢转身就走，哈林见状急忙去和大副交涉，结果给小狗也打了一张船票，问题才算解决。

香港剧场门框已写出了斗大的红字：中国戏剧大师梅兰芳、花脸大王金少山通力合作，准演中国古典名剧《英雄与美人》。这是哈林灵机一动给《霸王别姬》改的新名。票价相当于两石大米一张，却早被抢购一空。首演之日，剧场门前人头攒动，黑票价码翻了一倍还拐弯儿。

剧场内座无虚席，除港、澳同胞外，香港总督和一些官员也前来看戏。舞台前摆满了各界人士赠送的花篮，五彩缤纷，清香四溢。幕启，金少山扮演的项羽出场亮相，犹如半截黑塔威风凛凛。他唱[粉蝶儿]时，将最后一句：“……

征战华夷！”翻高八度，声大声宏，震耳欲聋，把坐在前排的港督吓了一跳！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台上的霸王，口中喃喃地说：“金嗓子！金嗓子！”

在两军交战中，众汉将用兵刃压住了霸王的大枪，双方较量。金少山在这里用了一个“节节高”的“哇呀呀……”表现人物的焦躁不安，怒不可遏。然后奋力挑开，并将一名汉将打翻马下，同时一个威武的亮相，冲出重围。将霸王的纵横驰骋的英姿表现的淋漓尽致，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随后，香港报纸刊载了哈林的文章。他说：“我把中国古典名剧《霸王别姬》改名《英雄与美人》，其原因是我曾上海连看四场演出，被这个英雄美人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迷住了。金少山先生就像猛虎一样，令人望而生畏。他那条世间少有的金嗓歌喉，使我震惊。梅兰芳先生以富有魅力的、变化无穷的表情和舞姿，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丽动人和情愫崇高的艺术形象，令人陶醉。这一对英雄美人可称举世无双。”

《英雄与美人》在香港先后演出10场，场场爆满。哈林乐得手舞足蹈，不时请梅、金二位赴宴。临别之前，香港动物园中一只老虎生了三只小虎崽，哈林买下一只，送给金少山作为纪念。寓意他演的霸王好似猛虎一般。金少山对这件礼物非常喜爱——可巧他正是属虎的。

桀骜不驯 演戏“溜桌”

金少山红遍上海滩，南京明星大戏院经理陈野禅慕名前来约请，双方签订了档期合同。在南京，金少山与名武生王虎辰合作演出的《连环套》一剧尤为走红。前半出的“坐寨盗马”，金少山驾轻就熟，酣畅优美。“拜山”一场王虎辰扮演的黄天霸在念白雄辩中互不示弱，二人功力悉敌。金少山更是凭借光明磊落的神态，刻画出草莽英雄窦尔敦讲求江湖义气的宏大气度和性格

特征。此次演出历时一个月，取得圆满成功。

就在金少山行将返沪的时候，突然南京青帮头子常玉清前来造访。原来常玉清是位“票友”，这次想为军政要人组织一场演出，特烦金少山续演一场《连环套》，并提出由他自己来演黄天霸。金少山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心想我在这儿唱了一个月，眼看明天就要启程，你却想过戏瘾；有心拒绝，又恐惹不起这位地头蛇，沉思了半晌，才勉强答应，可心里却有了打算。

第二天晚上，常玉清老早就来到戏院。布置停当，见前后台戒备森严，自己才去扮戏。届时蒋介石、何应钦等军政要人乘车而至，他们坐在第四排当中，前边的《打鱼杀家》快演完了，可金少山还没露面，这下可急坏了常玉清，他守候在电话机旁，接到在大旅社催请的人打来的几次电话，不是说：“金老板洗澡哪！”就是“金老板刮脸哪！”台上的“行围射猎”快结束时，后台有人喊了一声：“金老板来了！”只见金少山抱着“小黑炭”，款款地在众人拥簇之下走进后台，匆匆勾脸化妆上场。

“坐寨”开始，金少山一句[西皮导板]：“将酒宴摆置在分金厅上……”高亢嘹亮，气贯长虹，观众齐声喝彩。台下的蒋介石也心花怒放，看了一眼坐在他左侧的何应钦，微微点点头。接下来的[原板]，金少山唱得流畅自然。人们再一次叫好之后，只听得愈唱声音愈小，到“饮罢了杯中酒……”时，简直有气无力了。只见窦尔敦连人带杯突然一下子出溜到桌子底下了。胡琴、板鼓也随之中止，顿时场内大乱，检场的不得不将大幕关闭，人们纷纷退场。坐在台下的蒋介石等人也莫名其妙！他命令副官长快去后台看看，并通知急救站，立即进行抢救！说罢起身离去，这场戏不欢而散。

何应钦把常玉清叫到休息室严加训斥。他厉声质问：“演员有病，为什么还叫他唱戏？好好

地把他送回上海，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常玉清哪敢怠慢，急忙赶到医院，询问医生之后，得知没有什么大病，这才放心。同时无奈地派人购买了头等火车票，负责把金老板送回上海。

救场补台 提携后学

金少山演戏时，对合作者偶尔出现的意外，往往能及时补台。有一次在北京中和戏院演出《牧虎关》，金少山演高旺，魏连芳演张保之妻。魏连芳对这个角色不太熟悉。当演到高旺与张妻会见时，张妻在城楼上唱一句：“番儿与我下城关。”然后率兵出城，与高旺“过合”交战，接着再唱下一句，不料魏连芳一时忘词。胡琴响了，他有些手足无措；金少山一见，顿时明白了，立即提醒她：“要想过关难上难！”当时魏连芳满脸通红，赶紧接唱这句词，总算没出差错。戏打住后，魏连芳羞涩地回到化妆室，心中十分难过。金少山来到她的面前，诚恳地说：“莲芳，你今儿演得不错，你辛苦了！”魏连芳听了知道这是鼓励自己，不由得热泪盈眶，双手拉住金少山的手激动地说：“三叔，我谢谢您！”此后，她常对人讲起，金少山的戏德高尚。

另一次，金少山与马连昆合演《白良关》。金少山扮尉迟恭，马连昆扮演尉迟宝林，演到父子会阵时，性情诙谐的马连昆给金少山出个难题，把唱词临时改了，还甩了各腔；不料金少山很镇静，仍然按原词演出，获得观众喝彩，使得马连昆自食其果。剧终后，马连昆感到开这种玩笑不合适，他来到化妆室向金少山道歉。金少山却说：“你唱的那句词挺好，唱法也发挥了你的特长，应该各有千秋！”并告诉管事的：“今晚给他多开五块钱！”马连昆看到金少山技艺超群，气量不小，很是佩服，此后便尽心尽力的在金剧团唱戏了。

金少山对青年演员也是尽心培养。她看了青

年演员吴素秋的演出，认为这个女孩子风华正茂，很有发展前途。后经孙焕如介绍，他收吴素秋做了干女儿，由此二人合作演了几场戏。其中一次是“双出”，前场戏《牛郎织女》，吴素秋扮演的织女婀娜多姿，仪态万千；金少山反串牛郎朴实无华，憨态可掬。他不仅花脸嗓好，而且小生嗓也好。在牛郎放牛一场中，他唱一段[西皮娃娃调]，在台上“扯四门”，获得了阵阵掌声。观众心中纳闷：“金少山是铜锤花脸，怎么还能反串牛郎呢？”原来，金少山少年时期曾拜德珺如为师学过小生戏，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剧场中休息十分钟后，上大轴戏《探阴山》，金少山演包拯，吴素秋演柳金蝉，二人一问一答，配合默契。这出戏与前场对照，使观众耳目一新。为此，金少山威名远震，而吴素秋也声誉鹊起。

劳逸适度 重义轻财

金少山自1936年在沪与梅兰芳合作后，声誉鹊起。1937年来京，与陈少霖、李多奎组建松竹社。以花脸挑班（领衔）演出《连环套》《头二本草桥关》《清风寨》《刺王僚》《遇皇后》《打龙袍》等，名震京城。观众都一睹为快，每次演出都座无虚席。因此演完一期，他便过起休闲生活，听书、聆曲、豢养宠物。同时把行头也送进当铺里存放。一般邀角者看准时机，登门拜望，恳切地说：“现在观众都期待很久了；您应该露一露啦！”金少山也觉得休整得差不多了，由于盛情难却，遂顺水推舟地说：“那就赎行头去吧！”来人喜出望外，赶紧筹备演出事宜。是时观者如云，上座极佳，收入自然丰厚。但他对钱财并不在意，不时参加一些义演，还乐于资助困难同行。他觉得很惬意，自称“散财童子”。

1948年7月金少山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59岁。弟子有吴松岩、赵炳啸等。铜锤花脸王泉奎、姜振奎、赵文奎亦宗其唱法。

区档案局召开“两学一做”动员部署会

依据中央指示精神及市区委的安排部署，5月11日上午，区档案局召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党群办同志部署了本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方案，全体党员干部观看学习了党员教育光盘《如何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见成效》，深入领会“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党组书记、局长李茂福出席会议并做了动员讲话。

局长李茂福指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党内学习教育拓展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坚定理想信念、统一思想行动的新路标，是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凝聚力战斗力的必修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重点在改，根本在行，广大党员要坚持学做结合、以知促行、知行合一，努力实现学、做、改、行的有机统一。全体党员要深刻认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抓好组织领导，要以首善的标准，把严的要求贯穿于全过程，始终坚持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确保学习教育见行动、见实效；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档案事业发展的强劲动力，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艰苦奋斗、勇于担当，立足本职，为档案事业“十三五”发展做贡献。



西城区档案局（馆）以口述档案助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2016年6月2日西城区档案局（馆）与区老干部局共同召开《西城追忆》专题座谈会，邀请原西城区、宣武区曾长期从事过党的组织、宣传等党务工作的八位离退休老领导介绍工作中经历过的全区党员学习教育活动情况。会上，曾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原西城区人大主任齐家惠同志讲述了如何用“三会一课”制度来抓好党员的学习教育；原西城区委书记刘贵岭同志讲述了在他任职期间下大力度加强基层党支部建设的过程；原宣武区常务副区长蒋德忠同志为我们回顾了历次党的学习教育活动情况；此外，其他几位老领导也踊跃发言，分享他们任职期间开展党员学习教育以及加强党建工作的经验，并针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畅谈自己的看法及学习体会。最后，西城区档案局（馆）长李茂福同志说：“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今天听取各位老领导的发言便是一次很好的党课教育，我们会将这些历史记忆以口述档案的形式留存进档案馆，为今后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提供借鉴。”

西城区档案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

2016年5月4日，西城区档案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学会22名理事和监事参加会议。会议审议了学会2015年学会工作总结、2016年学会工作要点和2014年、2015年学会财务收支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增选马妍薇为学会监事长的议案。各位理事、监事就学会工作和档案工作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区档案局局长、学会理事长李茂福提出，一是要加强学习，提高政策落实水平。例如5大发展理念内涵是什么，怎样和档案事业发展对接；二是加强管理，提高工作规范水平。要积极开展工作，扩大学会影响力和会员队伍；三是加强研究，提高业务学术水平。学会要成为档案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在学术研

究上下把力气。他希望学会会员积极提交学术论文，可就档案工作某一点或工作上的心得体会进行阐述。

西城区档案局举办城建档案培训会

为落实和推动北京市2016年重大工程项目档案工作任务，推动西城区档案人员城建档案管理水平，4月19日，西城区档案局举办了城建档案培训会。会议由区档案局副局长金梅主持、北京市城建档案馆副研究员蒋蓉和高级工程师吴宇主讲，全区立档单位专兼职档案员及工程项目档案管理人员共计190多人参加了会议。蒋蓉老师从城建档案工作体制关系、北京市现行工程档案管理的法规依据及相关要求、《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及提高城建档案法律意识的重要性等方面进行了解读；吴宇老师从城建档案归档内容、归档文件质量要求、组卷原则、案卷要求及范例、竣工图的编制五个方面详细讲授了工程竣工档案管理和编制要求，丰富了到会人员工程档案管理的知识。两位专家的授课得到热烈反响，到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随后，金梅副局长进一步强调了做好城建档案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希望大家以此次培训会为契机，扎实做好我区城建档案管理工作，规范我区工程项目档案，有效提升我区档案管理工作水平。

区档案局开展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为迎接建党95周年，6月28日，区档案局在陶然亭公园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了迎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倾听烈士事迹，缅怀先烈遗志，对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深刻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党总支书记金梅同志带领新老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在高君宇烈士墓前集体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让党员时刻牢记入党誓词，自觉遵守党的章程，终身践行党的誓言。

宣誓结束后，工会同志组织了健步走活动，大家积极响应和支持。一路上大家步履轻盈，欢

声笑语，呼吸着新鲜空气，健步在如茵的绿树与美丽的花草之间，充分享受初夏的温暖与惬意。

本次活动是我局“两学一做”系列活动之一。今年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是推动学习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扩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既能够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方向指引，也可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档案局的全体党员通过“两学一做”活动，认真审视自己的作为，努力做到知行统一、学用结合，提高党性修养，强化纪律和规矩，努力争当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不断书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崭新篇章。



区档案局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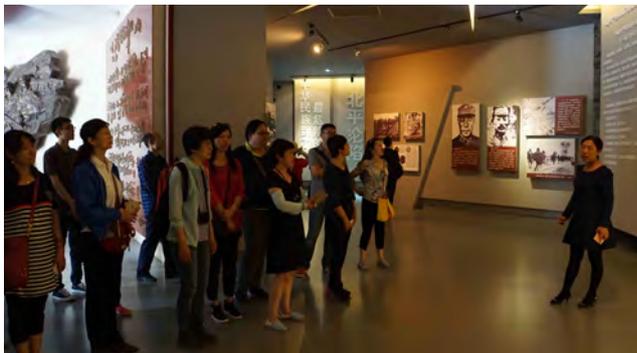
依据中央指示精神、市、区委安排部署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计划，5月27日，区档案局组织党员参观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温了抗日革命先烈的光荣事迹。

平西抗日根据地，包括北平以西的房山、良乡、宛平、昌平、涿县、涞水、蔚县、涿鹿、怀来、宣化、怀安、阳原12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辟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敌占区与晋察冀边区的一条重要通道，许多青年学生、爱国志士由此奔向根据地和

延安，奔向各个抗日战场，曾有几万名革命先烈壮烈牺牲，为国捐躯，谱写了悲壮的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

展览包括大量的实物和照片，从不同侧面、多个角度介绍了全国抗战形势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平西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悲壮历史，揭露了日寇侵我中华残害百姓的滔天罪行。平西人民在八年血与火的岁月里，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

在纪念馆里，党员们仔细聆听了讲解员的讲解，观看了展出的照片，文物和复原景观，重温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曲折历史和过程，深深体会到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革命爱国主义教育。大家表示要继承革命先辈的遗志，大力弘扬革命先辈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牢记使命，立足本职，爱岗敬业，积极推进档案事业的新发展，以实际行动告慰先烈英灵，为党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城区档案馆馆藏档案数字化成绩显著

在“十二五”时期，西城区档案馆在主管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增加馆藏档案数字化投入，精心组织、规范管理、强化落实，5年共完成馆藏档案数字化1763.9万页。截止到2015年12月底，西城区馆藏档案数字化累计完成1808.1万页，13632GB，馆藏档案数字化率达到80%。涉及居民生活的婚姻档案、招工档案、知青档案全部实现

数字化，极大方便了档案利用者，保护了档案原件，档案信息化建设取得快速发展。

西城区档案局开展档案法制宣传活动

为了更好地宣传档案法律法规，增强民众档案法制意识，6月13日，西城区档案局联合北京市城建档案馆和牛街街道共计20余人，在菜园北里社区开展了以“档案与民生”为主题的档案法制宣传活动。当天上午，我局通过展板展示、问题解答、宣传品发放等形式，向附近的市民和过往群众介绍档案法律法规和档案管理、利用及家庭建档等知识。此次宣传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吸引了许多社区居民和过往群众积极参与，现场展示宣传展板12块，接待居民300余人，发放档案法制宣传资料14种共计2921件（册），活动有效提高了民众档案法律意识，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洋镜头下的老北京——西城区档案局第二期“档案记忆西城”公益讲座

5月18日，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刘阳在西长安街街道机关，为社区工作者和街道老住户及文史爱好者120余人讲述了《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洋镜头下的老北京》。

讲座从19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北平解放初期，西方摄影师带着不同的目的来到北京，拍摄北京及其周边，这些老照片都是老北京建筑、民俗和市井的珍贵记录，很多被拍摄的老建筑现今已消失或变样，这些照片真实见证了上世纪的老

北京风貌。比如，西长安街南侧的“香妃楼”与新华门、西单地区的商铺等。

“档案记忆西城”公益讲座进一步挖掘了西城文化内涵，将西城的历史文化渗透到群众心中，实现档案信息的普及利用，最大限度的发挥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宣传教育职能。

“北京市旧城中心区历史照片展览”“西城外事礼品展”开展

2016年6月开始，由北京市城建档案馆、西城区档案局（馆）共同举办的“北京市旧城中心区历史照片展览”和由西城区政府外事办公室、西城区档案局（馆）共同举办的“西城外事礼品展”在西城区档案馆南馆二层大厅相继展出。

“北京市旧城中心区历史照片展览”由市城建档案馆制作，共18块展板，展出了1965年3月拍摄的北京市二环内城墙、城楼、护城河沿岸、街道的旧貌旧景。“西城外事礼品展”展出了西城区近年来在外事交往中收到的来自多个国家、风格不同的展品30余件。展览首日，市档案局领导曲安、市档案局区县业务指导处副处长刘立等领导参观了展览。

查阅档案，为顺利召开西城劳模事迹展奠定坚实基础

2016年3月，区总工会经主席办公会决定，临时成立一个劳模专项小组，专门负责筹备西城劳模事迹展，并将于一个月后正式进行展示。劳模专项小组对区总工会的劳模工作进行大致梳理，发现所涉及的劳模数量众多，其中退休劳模更是占了绝大多数比例，再加上部分劳模资料是在2010年以后才逐步完善的，资料不足给专项小组工作带来极大的阻力，这时，档案的查阅对劳模事迹展的顺利展出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区总工会档案员积极配合档案查阅工作，协助展览筹备人员从档案中查阅到了部分70年代劳模工作照片、有关劳模的通知、不同年代劳模名册、劳模表，1979年全国劳模工作恢复的通知、部分劳模照片及劳模信息等等。在这些资料的帮助下，专项小组先后完成了劳模宣传月活动策划，部分年代文案初稿等等。在实际查找资料的

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西城区档案馆的大力支持，为劳模专项小组前去查阅资料提供巨大的便利，也找到了大量珍贵资料。

4月13日，西城劳模事迹展在文化馆顺利开幕，展览延续到五月劳模宣传月。这次所用资料也已妥善保存，以便为日后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可靠的依据。区总工会档案工作完善，为顺利举办西城劳模事迹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悠悠胡同情”——西城区档案局第三期“档案记忆西城”公益讲座

为配合“舒了先生胡同档案陈列展”，2016年6月13日，西城区档案局举办了第三期“档案记忆西城”公益讲座，邀请北京地理学会秘书长、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越先生主讲“悠悠胡同情”。

由于两位先生是相识多年的老友，因此，王越先生对舒了先生的“义举”大加赞扬，并在会场上多次提到舒先生的不易。

王越先生在北京土生土长，长期致力于人文地理和北京文化研究，研究北京胡同数十年，对胡同及胡同文化有独到的见解。

会上，王先生“破解”了很多胡同中的“疑案”。比如，在讲到胡同名称由来时，王先生说，有人提出“水井说”，认为胡同可能是元代蒙语的汉字表音，并以讹传讹地把胡同说成是来自蒙语“水井”。认为北京地名中有二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元代用蒙语称井为“胡同”的证据。事实上，“四眼井”指井有四个井口，在唐朝以前已经存在。四眼井还是宋代标准的水井形式，已绘入《清明上河图》中。可见，这些地名与蒙语没有任何关系。

王先生从北京胡同的分布、形状、地名等地理区域特征入手，讲了北京胡同的演变和发展，提出“胡同”源于古代的“巷”。自汉代以来，北方依“巷”的北音俗称“胡同”，南方依“巷”的吴音俗称“弄堂”。明朝把“衚衕”正式定为街巷通名，清末简写为“胡同”。

一个小时的讲座，观众意犹未尽，在了解老北京胡同文化的同时，又增长了新的知识。